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四期（交流文稿） 2011年1月1日

## 目 录

【可用鼠标+“Ctrl”键点击篇名选择】

康心如的两篇“右派言论” .....	2
父亲康心如的“右派”罪名	
怎样从“不予改正”到“应予改正”（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 .....	6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孙静轩） .....	15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李国元） .....	20
一对夫妻记者的遭遇（韦鼎、黎素芳口述，谭松整理） .....	24
唱了几首歌，坐了20年牢（诸溪口述，谭松整理） .....	27
在长寿湖一次难忘的住院经历（它山） .....	34
幸亏江青没找到我（万声口述，谭松整理） .....	42
长寿湖又一个延安老革命——朱恩源（朱恩源口述，谭松整理） .....	44
“麻麻哈哈”二十年（陈华口述，谭松整理） .....	45
我走向父亲死亡的地方（何隆华口述，谭松整理） .....	47
“我不想说那些事，提起头就昏”（戴儒愚口述，谭松整理） .....	51
在苦难中坚守（张一华口述，谭松整理） .....	52
俏皮话（网摘） .....	54
关于《巴山夜雨》 .....	54

## 康心如的两篇“右派言论”

**编者按：**2010年11月16日，在重庆朝天门广场历史名人馆举行了康心如先生（民国时期著名金融家、民营企业家，原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陪都重庆参议会议长）120诞辰纪念会，来自海内外媒体、学术界及重庆官方的人士，无不援引周恩来的话，称赞康心如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然而，这位“好朋友”在1949年毅然抉择不去台湾、香港而留在大陆，冒着风险迎接“解放”，被“共产”成为“无产阶级”之后，不但没有被承认其“无产者”身份，反而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其所谓“右派言论”还成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的批判重点之一。他的“右派言论”到底说了些什么？本刊特予转载——

### 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用人应该不问公私

——康心如在建建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编者按：康心如，男，民建会员，解放前重庆第一流的大资本家，曾任伪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伪国大代表等职。现为市民建会和工商联副主委、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

康对党一贯仇视，认为共产党与资本家“不能并立”。他“没有觉得资产阶级是臭的”，“不想摘帽子”，“也不想叛阶级”，坚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

在本文中他否定剥削性质；否认“公”、“私”的区别；反对资产阶级分子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主张取消“公”、“私”代表名义，主张用人不管阶级，不问公、私，其实质是企图抹煞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改变党的干部政策的政治方向，从而达到反对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目的。

当前公私共事关系是少数搞得好少数搞得很不好，多数是中间状态，多数私方，并未发挥积极作用。

关系搞得好的，也只是人事处得好，有职有权而已，还不敢说是充分贡献了才能，符合于国家要求。对此，我有下面几点看法：

**（一）公方和私方区别问题。**我对政策很怀疑，如赎买政策，私有制问题，所谓赎买是你的东西我给代价你拿出来，支配权已非你所有，但工商业者所有权交出了，今天仍说是私有制未取消。如民生公司船只、码头、屯（趸）船、早交出去了，名称亦不存在了，还有啥权？故私有制还存在的说法有问题。民生公司本身并无权处理财产，其他合营厂店亦然，私有制要自己有权才算数，现在财产既交出了，如何能说私有。持有股票得有定息，那是赎买，你的东西交给我，订了约每年给钱，权已不归你，所以只有经济上的关系，只是分期付款而已。国家投了点资，派了人谓之公方还有可说，“私方代表”就简直不通了，你有股只是股东，甚至连股东也说不上。在企业形式未变前，还有董事会、有私方，今天清产核资了，交了，私方代表，代表什么？既不管业务，也不管盈亏，“私方”代表什么东西？我觉得“公私合营”四字都可不要，国家政策是赎买，一年只有一亿多，如民生公司公股有好多，没有哪个说得出口，私股虽有数字，但无表可代。我说在企业中工作的都叫干部，就要有职、有权、有责，不管你是啥来源，负责人就是负责人，只要办到有责，就能有职，有权，有职有权有责企业就办起来了。什么公方、私方不去管他，充其量会计科有一项发息工作而已。

企业与定息并不联系，合营企业还有私方的啥子权？所以“公”“私”方名称首先要取消的。

**（二）为啥发生有职有权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作如按德才分配，何来职权问题，对于职权，政府对工商界是有照顾的，但工商业者应有自知之明，有德才，才可以去担当。如果还

不懂不会就不该当经理，学会再来好不好？我们不能有吃一辈子照顾饭的思想。这是工商业者一面。在政府方面，如他有德才就该给他当经理，如不行，不能纯粹强调照顾，因为强调照顾下文就不好听了，那样，就会搞成你不行，派个公方副经理帮助你，这实际就是叫你有职无权，正因为如此，才有某学院反映出的那种“本副院长因事出差，职务由院长代理”的笑话。

**(三)阶级关系问题。**我不懂，在一个企业内，一定不止工人和资产阶级，一定也会有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小资产阶级来说，缺点也很多，是否工人对他也和对待资产阶级一样？我不知道。而资产阶级所到之处一定有阶级关系，工人阶级看到怕被腐蚀，资产阶级碰到工人不敢说话怕侵蚀他，将来难得交待，这个思想是自卑思想，但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怕”的思想。阶级关系划得如此严，要公私关系处得好，我看很难。

还有一种说法，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同于工人阶级，因为还在拿定息，拿定息叫剥削，搞不通。定息是赎金，毛主席说过这是双方同意这样办的，又不是我要的，是你给的。但是今天拿定息，就是见人矮三寸，至于是否剥削，人民日报说是，我有不同看法，如工人创造的价值我分了，那是剥削，定息是买我的东西，给我的代价，不是我去分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钱，所以中央领导说拿定息是保护你们的权利。这决不是与工人阶级定了约要剥削你，更不是强迫工人阶级要给。所以有人对定息是剥削搞不通。

阶级要消灭，需要改造是一定的，但毛主席说人人都要改造，说资产阶级毒中得深我承认，但人民日报说要“脱胎换骨”，工商业者也有的居然自称要脱胎换骨。依我读线装书的理解，脱胎换骨是道家的说法，一个人修道，修到头顶上出婴儿叫脱胎，换骨是换仙骨，如此提法是否要工商界先学道、出婴儿、换仙骨，我看那只有二辈子再做好人了，资产阶级不是人，祖宗三代都错了，甚至有政协委员发言还把脱胎换骨做题目，如此怎能叫人不自卑。消灭阶级如何消灭法？是否放弃定息就是？是否二辈子做好人？这叫做无限期延期，资产阶级到处要人领导怎不自卑。有人说：“不要脸才好当骨干分子”，要自己把自己说得如何不行，如何不好，才是骨干分子，说二辈子当好人才是骨干分子。我看资产阶级，实际已消灭了，它的两个特点一叫唯利是图，一叫损人利己，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四)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如果企业行政不与党分开，私方无论如何也无法，党是政治组织，是各项工作的推动力，是需要的，但如拿党来代替了行政，包办一切，就不行。企业不外三样工作：①叫行政、②叫业务、③叫人事，党组织三样事都代办了，非党员只能受支配，不听鼓下橈怎么办？如现在副经理分工很好，但有人说管是归我管，只是党说了我签字。人事科更不说了，根本不会叫私方管的。这种情况要办到有权，如何得行？故无论在机关、企业，党委制即使存在，也应该反掉宗派主义，今天非党员是搞不成宗派的。党委制有好处，但不能代替行政。否则非党人士不可能办到有职有权。

**(五)今天国家对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照顾得非常好，但在若干企业内则不然，大家存啥心？总觉得有话不好说，说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何以会产生这种思想的？我认为主要是党与非党未建立友情。一个人不能一上班就有真知卓见，遇事需要大家研究，但企业有事总是三大推(党、团、非党)，这有历史关系，党团员职工总是把资产阶级当做毒草活麻，碰不得。绝无研究余地，也无研究机会。党团员没有想与工商业者建立友情，工商业者虽有此心也无此机会。这是普遍现象，碰了两回钉子就算了。**

归纳上面的情况，我有下面几点建议：

1. 取消公私代表的名义。

2. 安排工作只问才与德，不问公与私。照顾可在别方面照顾，如少点工作，生活困难多给点钱等，但职权地位不要照顾。

3. 不看是否党员、非党员，只看能力与德行，不要强调阶级关系。非党人士很多，如保存墙和沟，对国家建设事业有很大妨碍。

4. 建立友情。人是感情动物，“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样，积极因素可以发挥，潜力未可限量。旧社会私营工商业比重很大，经济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私营工商业上，工商业者有能力，也有经验，现在国营经济强大，又有了新的经济基础，如果把全工商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新旧基础合而为一，今后的发展起码可以增加一倍。

(原载“重庆工商”1957年10期，题目和编者按是本书编者加的)

## 私方服从公方领导，天然就会有沟有墙

——康心如五月二十三日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编者按：康心如在这个发言里所谈的“四种墙”，实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必定有沟有墙，因而要拆墙填沟，就要对资产阶级一视同仁，就不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墙的本质是阶级关系”，服从公方领导“天然就成了有职无权”，这是一切工商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个基本论调。只是说法各有不同而已。

我认为合营企业不但有墙，而且有四种墙。这四种墙是：1. 公私关系，2. 阶级关系，3. 党与非党关系，4. 职位上的关系。

先谈公私关系。全行业合营前的企业，公私代表都有必要，因为那时有董事会，私方代表还可以为私股办一些事。但是，在清产核资完毕，全行业并店合营以后，就没有分公私代表的必要了。因为，这时私方已被根据各自才能安排了适当职务，企业也交了，只拿定息；股东领息也不找私方，纠纷也不找私方，私方代表还能代表什么呢？从前私方代表还有事可作，现在只是一个抽象名词而已。可是，在下面企业里，公私都非常分明，并且还带一个尾巴——要服从公方领导。有的公方是副经理，私方是正经理，正经理却要受副经理领导。

墙的本质是阶级关系。企业内成了私方的都是资产阶级，公方都是工人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受工人阶级领导，在企业里私方人员也就必须服从职工领导。有了这种阶级的划分，私方人员就不敢接近职工了，怕人说腐蚀职工；职工也不敢接近私方人员，怕说是丧失立场。

党与非党关系。公方经理往往又兼党支部书记，事无巨细一把抓，私方人员就有职无权。

有了以上三种关系，职位上的关系就混淆不清。私方被安排为经理后，在职务上公方应服从私方，但是，由于以上这种墙的隔阂，私方有职有权就成了问题，天然就成了有职无权。因为这些原因，墙就天然形成了，这不奇怪。墙既然筑的这样高，私方人员怎能发挥积极性呢？说私方人员不发挥积极性，私方人员真是背了很大冤枉！为什么不采取按才录用发挥他的权？而要筑这种种的墙呢？我认为现在有90%以上的私方人员没有发挥积极性，这个责任政府应负主要责任，私方也要负一点。

墙要怎样拆？我建议，政府用人，不管是什么阶级，只问德才如何，给了职，就给予权；有职有权之外还应有责，有责就能完成任务。以德才用人，则墙不拆自拆。

不管是机关或是企业，党组织是必要的。但是职权应有划分。党组织除掌握政策外，行政权不应干涉。党组织可以监督行政负责人，但不应干涉他的权力。有些企业的党和行政负责人同是一个人，这是否恰当，值得怀疑。这样，党的作用不大，经理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今天都是人民，不信任就不给你职，给了职就应给他权。

凡是一个人生在社会上他都有知识有感情。他的知识从政府起，他都是尽力考虑了的。

私方人员茶余酒后都在谈论：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产。共产大家不怕，就是共产后，我怎样生活？解放初，政策是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资产阶级认为是河水不犯井水，资本家心里很高兴，一心搞企业，也即所谓唯利是图。忽然来了一个“五反”运动，真是一声晴天霹雳；连财产性命都保不住了。当然，政府政策不是如此。当时用和风细雨办法也是不可能的。以后政府又说，资本家是国家财富，要我们努力经营业务，资本家才慢慢抬起头来。但是，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何如？全行业合营时，才找到了命运的归宿所在。很高兴，敲锣打鼓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有人说，资产阶级是勉强，是假的，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敲锣打鼓还会是假心吗？

企业合营后，政府对资产阶级的职务作了安排，各得其所，这时资产阶级感激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内心都有一番抱负，一番雄心，想能够为国家贡献才能。谁知事情不尽那末如理想，私方有职无权，形成吃照顾饭，于是那番壮志和雄心就没有了。好像把我们安排了，有钱吃饱饭就完了，而友情就一概没有。还要改造我们、要我们“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波动很大，大家认为“他生未卜此生休”，只好等改造。但是，毛主席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特性：“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待之”，既说我吃照顾饭，我又怎能发挥积极性呢？

“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程度的友情，决非用赎买政策和几个金钱的照顾所能换来的。而是要平时互相关心和帮助。国家要利用知识分子，不仅要给以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待遇，还应当作知己。许多党员为党而死，不是为了地位、政治和经济待遇，而是因为党信任他，他也爱党。资产阶级虽有两面性，但是仍然有具备党员品质的人。只要党把这些人作为知己对待，这些人也会为党而死。

资产阶级在他们当初起家的时候，也是用了脑筋、费了心血的。把他们的积极因素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好处的，应当善于运用。

友情是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动力。没有友情就变成了雇佣关系。运用他们的能力，好处很大，因为这些人成熟了，有一套本领，把他们改造过来加以利用，比现培养人才收效快得多。

拆了墙，再加上友情，我们就会积极起来。

还谈一谈对政府的意见。群众反映，要求政府对每件事情都应该有个结果。能办不能办都希望有个答复，并说明理由。但是，好多问题都未得到答复，例如重庆解放时停业的行庄，清理到现在7年了，还没有结果。1954年就请示政府如何处理，1956年8月，说限8月底清理完，可是现在又石沉大海。美丰向人民银行请示公事10多件都没有答复。至今仍然没有答复，又不敢问，怕反映了得不到结果。政府检查下没有答复的有多少件，归了档吗？别人还在等候答复哩！我建议，仿效法院把全市解放以来的案件，清理一下，恐怕有千件未答复吧！这种拖拉作风是否把它列入整风。拖拉作风比旧社会还严重，不答复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

（原载1957年5月26日重庆日报，题目是编者加的）

（选自1957年8月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二集工商界）

## 父亲康心如的“右派”罪名 怎样从“不予改正”到“应予改正”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 屈武支持我为父亲申诉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给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接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决定对“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实际上就是平反）。这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是一项非同寻常的重要举措。

1957年所谓的整风反右运动，不但粗暴加罪于数十万知识分子，把全国人民也打得晕头转向。从此，全国人民只允许有一种声音，一个看法，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说真话，再也不敢向领导干部提意见。全国上下陷入虚伪、猜忌、恐惧之中。

现在，突然提出要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各单位为此都建立起了专门机构。据有关人士讲，99%以上的“右派”都要“改正”，这可是一件与我家关系极大的大事。

我父亲于1957年在四川重庆被划为“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沦为“贱民”，蒙受了奇耻大辱，在“文化大革命”中含着不白之冤离开了人世。

据母亲讲，1957年爹爹被戴上所谓的“右派”帽子之后，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老人家那羸弱的身体怎能承受？无奈，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不知哪位领导发了慈悲，又通知不让去了。

我的中学同学戴明哲的母亲，1996年在北京时对我讲：当年，她曾看见“康老瘦骨嶙峋，迎着风咳嗽，吃力地在扫大街”。

父亲30多岁得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病有如今天的癌症，是很难治愈的。一个在重庆行医的德国医生警告他，如果不离开重庆，就活不过50岁，因为重庆的气候对他治好这种病不利。但是他想到开办的实业在重庆才打开局面，为了全家（包括他两个弟弟在内）的未来，他决心继续挑着这副重担，在重庆干下去。

没有想到，到了60多岁，他还遭受这种不人道的折磨！他从重庆来北京度过的最后十年中，从未和子女谈及此冤案，不论哪个晚辈去看望他老人家，他总是笑脸相迎，谈笑风生，嘘寒问暖。我们看到他那慈祥而衰老的样子，心中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来，有多少眼泪想流而流不出啊！

我和妹妹于1951年离渝到京考大学后，只有父母二人留在重庆，相依为命。我对1957年父亲向共产党提过什么意见，怎样被当地的干部划成“右派”等前前后后的事，一无所知。据说，如今99%以上的所谓“右派”都要平反了，都承认是“错划”，而我父亲的问题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询问。

1979年，我给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去信，要求复查父亲的“右派”问题。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

同父异母的哥哥康国藩，也于同年9月去函要求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复查，结果一样——不予理睬！

面对这种情况，我当然不愿善罢甘休。我去找到屈武。

屈武这时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曾于20年代到苏联留学（听说他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战争时，他与于右任一起住在重庆领导事巷我三叔康心之家，翁婿二人与我父亲私交甚笃。据屈武老先生对我们讲，抗日期间，他经常出入我家，他总愿意坐在我家大客厅里一架落地式高级收音机旁，收听苏联和延安的广播，许多关于共产党的消息，他都是这样得到的。他还说：“在你们家收听这种广播，既安全又准确。收音机好不说，康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国民党不会来搜查的，是一个极好的避风港。”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时，屈武曾按周恩来的指示，借我三叔的住宅，约了一批社会贤达和周恩来接触，屈武还在我三叔家里秘密组织了一个帮助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秘密小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说明当时康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非同一般。

为了替父亲洗刷 1957 年所受的不白之冤，我决定找屈武帮忙。

屈老问我：“你敢肯定你爹的问题可以改正吗？”

我对当时的情况、中央的政策一点都不知道，对如何“改正”也不摸底。但我对父亲一生的为人却十分了解。共产党执政后，他对共产党政权积极拥护，寄予希望，我不相信他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事实上，他不仅不反对共产党，而且跟当时的广大资本家一样，听共产党的话，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1950 年，他用心血经营的美丰银行被迫停业，完全是出于无奈。据母亲讲，他为此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还曾动员全家老幼捐献出个人的钱财和首饰，企图力挽狂澜，维持美丰。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又把爹爹当成靶子审查了一通。母亲也被街道基层干部威逼交待父亲的“问题”。母亲说，那时一听见叫她去开会，就双腿发抖。后来，有关方面为了利用爹爹的社会声望，以利推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他担任重庆市投资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1957 年春，五哥康国藩在北京准备结婚，父亲正好在北京出公差，也顾不上等五哥的婚礼结束后再走。赶回重庆参加了最后一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鸣放会”，即被划为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当时重庆工商界有人昧着良心揭发他，说他建国前夕转移了 100 多万美金到国外去（当时重庆的报上刊登了这个揭发）。其实他没有转移一分钱到国外，他的子女也没有一人被他送到国外，只有一个女儿康宁，我同父异母的二姐，是早在 1947 年就随丈夫去的台湾。

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坚决地回答屈老说：“肯定应该改正！”

屈老说：“那好，你就写封信给我，把你们写信给重庆市委统战部要求改正，他们不予理睬的情况也写上，我设法把信转上去。”

于是，我按屈武说的写了一信，请中央统战部重新审查我父亲的案件。

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且有数十年中共党龄的孙起孟，和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共同签名，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屈武告诉我，他和孙起孟是“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时的“难友”。

## 重庆通知“不予改正”

一直到 1980 年 5 月，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才给我兄弟二人的所在单位分别来信，并附有关对父亲“右派”问题不予改正的复查结论，要求单位转告我们。来信及复查结论全文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市统〔1980〕98 号

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党委：

你处职工康国雄同志之父康心如先生（已病故）的右派复查结论，经中共重庆市委今年二月十一日讨论，决定不予改正。现将“关于康心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寄上。请你们告

诉康国雄同志，并请协助作好本人的思想工作。

致以

敬礼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5月12日

## 关于康心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康心如，男，1889年生，陕西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曾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60余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原国民党国大代表、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年7月划为极右分子，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委员和民建会籍，撤消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7级。1960年10月摘帽，1961年迁北京居住，1969年病逝。

原划为右派主要依据是：

1. 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他说：“古今中外，执政者有两种，即霸道和恕道，亦即施仁政或暴政。暴政易施，但不巩固，古代的秦始皇，现在的斯大林。仁政难施，乃治本之道。施仁政要有条件，民殷物丰。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吃饭都成问题，国家物资很缺乏。执政者人为使然”。

2. 曲解赎买政策。说：“定息是赎金，不是剥削，是双方同意办的，不是一方强要的”。不承认资产阶级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说：“脱胎换骨是道家的说法，只是二辈子做人才办得到”。

3. 不承认私方代表。阶级关系划得如此严，要公私关系处得好，我看很难。

4. 认为党缺乏友情，没有人情味。

经复查，上述内容是康心如于1957年6月在市委召开的工商界人士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的报纸、记录和本人检查，基本都是一致的，事实没有出入。原划右派的依据中的二、三、四部分，言论有差误，反映了他的资本主义立场。第一部分即暴政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诬蔑，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仅此一条即够右派。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有关规定，不予改正。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1月22日

## 屈武在中央统战部慷慨陈词

重庆市委统战部这一封来信，无异给了我一闷棍！

但是，我冷静下来反复阅读“复查结论”，觉得疑点甚多。

他们坚持错误，不肯给父亲改正的主要根据是第一条，即所谓“暴政”问题。从这一段文字看，不像是发言；极有可能是断章取义乃至诬陷不实之词。

“结论”还说：“当时的报纸、记录和本人检查基本一致，没有出入”。父亲的发言记录和本人检查都被官方收藏，即使家里留有手稿，经过多次抄家也早已无从查找。但“当时的



报纸”按理说应该还查得到。

既然他们提到三个“一致”，就提醒了我：唯一可以查核的就该是报纸了。考虑到父亲当时在重庆的身份地位，他的发言也会在报纸上刊登的。

正巧，妹夫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这是全国最大，藏书和报刊资料最全的图书馆。他花了不少时间，把1957年《重庆日报》上父亲的发言全部摘抄下来。

在这些记载中，我们找来找去，根本找不到“复查结论”中所说的“暴政”字样。

难道抄录时漏掉了？

我们又一次仔细地查阅了当年的相关报纸，《重庆日报》1957年5月23日登了我父亲发言的全文。

正好，这时北京图书馆刚开始使用静电复印机，这次我们就把报纸上所有有关父亲的材料，全部一式二份地复印了下来，共有十二篇。然后再一次仔细地反复查阅这些文章，

结果，不但没有“暴政”二字，连跟他们写的关于“暴政”那一段文字相似的意思都没有！

按当时运动的规定，必须在会上的发言才能定案。相反的，从报上登的我父亲的全部发言来看，都是从善意出发，不仅没有攻击共产党的任何话语，而且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我们还认为语气温和，并不尖锐。

啊！苍天在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几年了，“反右”运动也过去二十余年了，居然还会有人无中生有编造事实，继续发挥50年代整人的手段诬陷好人！

我带着强烈的愤怒情绪去找屈武老先生，把所有复印下来的证据也带给他。我必须从上到下地来搬掉这块栽赃陷害的巨石，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屈老看过材料后说：“让我先想想。”

几天后，屈老的儿子屈北大来我家谈了以下情况：

昨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集各民主党派内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改正右派的问题。在会议上征求大家意见，改正右派问题是否可以告一段落了？屈老在这次会议上，把我父亲的问题提出来，慷慨激昂地发了一通言。指出外地“改正右派”的阻力很大，并举出我父亲的例子来说明。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他当然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屈老还通知我，把我要求平反的详细经过再写一份材料送去，并附上我从北图复印来的有关父亲在1957年鸣放会上的发言全文，并要我第二天上午一定送到。因为下午还要继续开中央统战部的会。

我赶忙写好信，并把报纸复印件全套附上，送到屈老家，开会时，屈老把材料让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彭友今看了。彭友今看完材料后只说了一句话：

“这可以定为诬告罪。”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对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复查改正问题显然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说，中央统战部还派了专人去重庆督促处理我父亲的问题。

## 承认“改正”又留尾巴

1980年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给我所在单位和本人各寄信函一件，说明我

父亲的问题经再次复查，决定予以改正。

同样还是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这批人，见到中央统战部的态度后，便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我不由得激动万分，要不是我认真查核历史材料，他们岂不仍然在 1957 年的基础上继续害人吗？！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再次来函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部用笺  
市统〔80〕232 号

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党委：

你处职工康国雄同志之父亲康心如先生（已故）的右派复查问题，根据中央〔1978〕55 号文件精神和康心如先生子女的申诉，我们再次作了复查，经中共重庆市委今年八月七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现将《关于康心如先生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寄上，请你们转一份给康国雄同志。我部今年五月十二日去函所附《关于康心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予以撤销，请即退还我们。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 年 8 月 25 日

通过我所在单位转给我的信件抄录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用笺

康国雄同志：

根据中央统战部有关指示精神，我部对你的亲属康心如同志的右派问题改正结论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结论一份寄去，请查收保存，有意见望告。原结论请销毁。

此致

敬礼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 年 5 月 12 日

因结论没有多印，只能再寄去一份。你处组织已发了改正通知。

关于我父亲改正的第二次文件，就是 180 度转弯的那份结论全文抄录如下：

康心如，男，1889 年生。陕西省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历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六十余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重庆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 年 6 月划为极右分子，1958 年 5 月处理为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和民建会籍。撤销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 13 级降为 17 级。1960 年 10 月摘帽，1961 年迁居北京，1969 年病逝。

1958 年 5 月处理康心如右派问题时所列的主要事实有：（1）歪曲赎买政策，否定定息是剥削。认为赎买是政府拿钱买他的东西，定息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2）否认资产阶

级的两面性，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说“脱胎换骨”是道家的说法，使资本家的“改造无限延期”，只有二辈子做好人。(3)主张取消阶级关系，否认党的领导。认为企业无私可代，可以取消“公私合营”四字，企业阶级关系划得那样严，要搞好公私关系很困难。(4)打击骨干分子。说：“不要脸才当骨干分子”，反对民建会、工商联作为“改造之家”。

现在复查，上述内容是康心如 1957 年在市委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见 1957 年《重庆工商》第 10 期、1957 年 5 月 26 日《重庆日报》)，康的发言内容是有错误的，但尚属对局部性的工作和政策的意见，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批评教育，也承认了错误。根据中央〔1978〕55 号文件，1957 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原划康心如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其家属的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有关材料应予销毁。

我部今年 1 月 22 日曾对康心如的右派问题作过不改正的结论，现查该结论所列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问题，不是康心如 1957 年在鸣放座谈会上正式发言，原结论应予撤销。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 年 7 月 29 日

这前后两份结论的内容，有许多明显的疑点。

第二次结论中“暴政”一段话没有了，却变相改头换面地继续诬陷说：“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问题，不是康心如 1957 年在鸣放座谈会上正式发言。”继续无中生有地编造。完全暴露了他们不愿爽快承认自己错误的心态。

复查后，可以改正了，“暴政”一条罪名没有了，却又加了另一条罪名(第四条)。但是在我父亲当年的发言记录和检查中都没有那些文字。如果当年有那样的言论而不检讨，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当年的“认罪书”通过了，却没有如今这个第四条所列的罪名，现在平反，倒又凭空添上这一条。岂不是滑稽吗？

后来他们解释，“暴政”云云是在会下给个别人讲的。据说 1957 年划“右派”定性的根据是以鸣放会上的发言为准，会下与个别人的谈话不足为据。这显然是重庆的某些人为当年整人行为作的一种狡辩；也许他们想留一个尾巴，一旦将来政治气候变了，他们又可以变成“正确”的！

我怀着这种不无委屈的想法去找屈老，他劝我说：“国雄，不要再提了，这其中的问题我不好向你谈，你就不要再追了。这回他们是 180 度大转弯，你得让他们下台阶。他们已经很被动了。你怕他们再整你，现在的气候他们整不了，将来气候变了要整你，即便没有这句话也可以整嘛！”

听罢屈老这一番话，我心情平静了一点。想想 1957 年给“右派”定罪，真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讲过什么可以定罪，你没讲过也能定罪，当时就是如此的无法无天。直到二十年后要改正错误还这样艰难，像屈武这样的老干部对这其中的问题都表示“不好向你谈”，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父亲平反后，我去向父亲的好友陈铭德、邓季惺报喜，邓季惺告诉我，在一次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上，有人讲话时说，原工商联执委中的“右派”只有康心如和某某两人没有改正了，但马上有人纠正说，康心如已经改正了。

我问邓老，另一位怎么没有得到改正呢？她笑道：“他没得一个能干的儿子嘛！”

## 原来他们本不想“改正”

后来，重庆又作出一个再次修改过的改正结论，干脆不再提当年划“右派”的“主要事实”了：

## 关于康心如先生错划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康心如，男，1898年生。陕西省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历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六十余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重庆临参会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年6月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5月处理为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和民建会籍，撤消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7级。1960年10月摘帽，1961年迁居北京，1969年病逝。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原划康心如先生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7月29日

1983年12月26日修改

我曾听一位堂姐说，她有一位朋友在重庆市委工作。他给她讲了一个说法：重庆当时曾印发过一份有关“改正右派”的文件，其中提到：重庆市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除康心如一人外，其他人都给予改正……

我的儿子宏通后来去看望屈武，屈老也对他说：“四川当时就想留下你爷爷不给改正，要不是你父亲能干，恐怕就只好办了。”

原来他们本不想给我父亲改正！

只是在中央统战部的压力下，加上我提供的报纸材料的有力证据，驳倒了他们的凭空诬陷，他们才迫不得已“给予改正”。但是，以前发的那个“除康心如一人外”的文件明令撤销收回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又不可能专门再发一个“康心如一人也给予改正”的文件。这在单位和社会上必然造成一种不明不白的混乱。

我决心要让重庆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都明确知道我父亲得到平反改正的事。

## 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追悼会

本来，我并不认识孙起孟老先生，只知道他曾与屈老共同联合签字，把我所写的材料转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表示感谢，我亲自登门拜访。

孙老谦虚地说：“这是应该做的事。党有政策，你提供的材料也很过硬，不然，事情就难办了。”

我向孙老提出自己的想法。

1957年，共产党动员各界人士提意见，帮助他们整风。我父亲匆匆从北京赶回重庆市参加鸣放会，善意地向共产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所提的意见在报纸上公布后，还曾收到一些群众的信，表示支持，认为他说了公道话等等。我父亲过去办实业，对发展西南金融贡献甚大，社会地位颇高，在群众中有影响。在他蒙冤后，仍有不相识的人给他写信，安慰他、鼓

动他。

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台湾电台曾多次在广播上鼓动他逃出大陆，台湾方面欢迎他……这个广播讲话，四川有不少朋友都收听到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叫王政的，写信给我父亲说，想见面谈一谈，有要事相商。要求我父亲于×年×月×日在报纸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告诉他一个见面的地址。

我父亲心地坦荡，为人光明磊落，不愿意与不相干的人偷偷摸摸联系什么。他拿着此信，与母亲一起到统战部去请示。统战部研究后答复可以相约，地址订在我四叔康心远家中。只是约见的时间比来信规定的时间推迟了两天。

约见那天，那个叫王政的也来了，他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走（离开大陆）？我父亲答道，年岁已大，不想走了。王某又问了他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后就走了。

即日，我父亲将经过情况，向统战部作了汇报。

我将这些情况向孙起孟老先生谈了，说明我父亲在社会上的深远影响。我建议，乘“改正错划右派”的机会，通过新闻媒介，向国内外作一次宣传。

孙老问我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建议在重庆召开一次追悼会，并登报。孙老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并认为还可以通过对外广播的方式，向海外及港台宣布。

我心中只有一个目的，父亲去世已十几年了，但必须要为他找回这个公道。

孙老要我写出书面意见。

1981年2月，全国工商联秘书长黄凉尘（原在重庆作过宝元通公司总经理）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面谈。当时，他刚参加完了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

黄凉尘告诉我，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的追悼会，康先生在西南金融界影响大，应在重庆开这个追悼会。问我有什么要求，对追悼会规格大小有什么想法等。

我表示，父亲离开人世十几年了，追悼会规模大与小都无所谓，3000人与3个人开会意思都一样，关键是追悼词，我们要事先看过，同意再用。因为，我对那些患有左倾顽症的官老爷是有警惕的。

黄凉尘还说，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康家人口众多，可以报销一部分差旅费，但不能太多。我表示经费问题不大，能报销多少，就报销多少，只要能开追悼会，我们可以自费前往重庆。

几天后，民建重庆市委派其副主任委员黄明安来京找我商谈，他说：“给康老开追悼会中央已批准，按老红军规格，国家拨款500元。”问我对追悼词有何意见，希望提出具体要求。

我说很简单，只要三条：

1、父亲是爱国的。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中年以后，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对发展四川经济有重要贡献，

2、父亲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他的八个儿女中，没有一个送出大陆（只有一个女儿于1947年随夫去台湾工作），也没有转移过一块钱到国外。

3、错划右派，应予平反改正。

追悼会时间定在1981年3月15日以后。在四川，我们已无家可归，也无亲戚可投靠，只要求重庆有关单位代订住所，费用我们自理。

不久，追悼词文稿寄来，调子很低，只承认我父亲在“我市工商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解放后，在我省、市做过一些有益工作”，“1957年错划右派”。追悼会日子定在3月18日，如我方同意，即通知重庆市有关方面准备。

追悼词的调子提得这么低，我本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们被迫承认了我父亲的作用，如果再往返探讨几次，时光都白白流逝了。从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讲，不可能再提到什么高度。至少，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件事从头到尾办错了。这就行了。

我们只好就这样定下来了。

## 感慨万千回重庆

为参加追悼会，我们全家一共去了10口人，由母亲带队，我们怀着既兴奋，又悲痛的心情回到了久别的重庆。

1981年3月16日，以“康心如同志追悼会筹备组”的名义发了讣告。1981年3月28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重庆市沧白路市政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通知面很小，因而参加的人不多。筹备组只通知了民建和工商联两个单位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原美丰银行的老行员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因此没有人来参加追悼会。

事后，原美丰银行的老行员知道康心如平反恢复名誉了，都很高兴，他们说，过去总挨批，说他们为大资本家、右派服务，现在肯定康老对四川省、重庆市有贡献，那我们也为此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在重庆的原美丰银行的行员，还自发组织了一个联谊会，每年都聚会一次，后来发展为每年聚会两次。一个被整垮了的老民营企业的员工，能这样自觉自愿地组织起联谊会并且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可见当年那个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凝聚力有多大。

我们总算达到了目的，为父亲出了一口气，但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得到一点慰藉。

追悼会召开后的第二天，1981年3月29日，在《重庆日报》头版正下方，刊登了有关我父亲追悼会的消息，全文如下：

### 原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康心如追悼会在市政协礼堂举行

本报讯 原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市投资公司经理康心如追悼会，昨天上午在市政协礼堂举行。

康心如同志于1969年11月16日因病逝世，终年79岁。

追悼会由民建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昆水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白银彰致悼词。

悼词说，康心如同志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活动。解放前，他主要从事金融事业。对我省、我市民族工商业、金融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解放后，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现已改正，恢复名誉。

追悼会后，原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杨受百向我们说，是他提议要白某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的。因为他认为，“1957年把康二爷划成右派，他是有责任的。”

我们全家下榻在原柴家巷大院旧址对面的和平公寓，杨受百还对我说：“国雄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安排你们住在这里吗？这里是康二爷当年当重庆投资公司经理的时候主持修建的！”

报纸上刊登的这一条短短的消息，是我们盼望多年的。但是我们读到后，心情并不那么舒畅，仍感压抑，原因是有关人员对我父亲的评价压得不能再低了。他们明明知道我父亲在建国前对重庆市的金融界贡献甚大，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关人员坚持不提“重要贡献”，而只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康心如追悼会像一颗小石子在重庆引起一股小波澜，一些正直善良的重庆老人纷纷到我们下榻处，异口同声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拉开电灯，打开水龙头，就想起康老对重庆市的金融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接我母亲的民建会人员，私下对母亲讲：“多亏你儿子。他们想把康老留在右派里，没有中央的指示，康老是不会平反的。”

我们一行人开完追悼会，就纷纷离开重庆，到成都去休整了几天。

重庆有那么多能勾起我们感情、留恋和回忆的地方。我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汪山，培养我成长的几个中学，当然更有我们那慈祥而了不起的父亲所留下的足迹，和他倾注毕生心血为之奋斗，发展与发达于重庆，最后也在重庆倒闭的美丰银行。也正是重庆这个城市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一生的荣辱大部分与这座山城有关，我们想再寻觅一下父亲的足迹，再呼吸几口父亲曾呼吸过的空气。

可是，想到我父亲所谓“右派”问题平反改正的艰难，想到这次追悼会的勉强召开，悼词对我父亲评价的有意压低，种种令人不快的情况都使我们不愿久留。

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但愿在我们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祖国，不要再搞那种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不要再让好人蒙冤，坏人得势。

（摘自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

康国雄传奇人生》第十四章“父亲平反一波三折”。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孙静轩

**编者按：**孙静轩（1930—2003），山东肥城人，出身贫苦，13岁投奔中共领导的“根据地”，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共培养的青年诗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狠批“资产阶级右派”，紧跟毛泽东，“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幸在反右运动已近尾声时对重庆文联的反右“扩大化”提出质疑，遭到主持整人者批评，孙自恃根红苗正，负气回应：“你该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吧？”遂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重庆市长寿湖劳动改造。1963年“摘帽”后调四川省文联。晚年著有反思历史的长诗《告别二十世纪》。

孙静轩于2003年6月在成都病逝。右派作家张先痴写了一篇纪念孙静轩的文章《右派诗人孙静轩的生前死后》，结尾时他写到悼念孙静轩时的盛况：

作协宿舍门前的花圈早已将围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附近的几家花圈店都被来人买光，只得从远处调运。是夜，临时搭就的灵堂里，烛光守夜的年轻诗人们彻夜朗诵着孙静轩一首又一首遗作……

我在这座省会城市已生活了二十多年，见到的葬礼已难以数计，有权倾一方的高官，也有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们中有谁能享受到孙静轩赢得的这份景仰，这份自发的、真正来自民间的景仰！

这份荣幸对爱国爱民的诗人孙静轩应当是受之无愧的。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桑塔里那

呵，人们，你们可曾看见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呵，人们，不要说  
大地是这样秀丽，天空是这般晴朗  
他，那个幽灵，就像一阵风，一缕烟  
自由自在地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大模大样地闯进农民的家里  
趾高气扬地走进牧民的毡房  
发号施令，骄横不可一世  
就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一样  
好象他掌握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我们的一切全都是他的恩典赐赏……

呵，人们，你们可曾看见  
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如今是二十世纪，人类已进入原子时代  
再谈论幽灵，也许过于荒唐  
但毕竟是一个可怕而又可悲的事实呵  
他，那个幽灵，就象一阵风，一缕烟  
正自由自在地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就像你的影子一样追随着你  
你怎样也无法摆脱他那无形的魔掌  
他悄悄地吸吮着你的血液和骨髓  
他支配你的行动，控制着你的思想  
他可以随意地扭曲你的人格  
可以摧毁你美的要求，爱的欲望  
只要他稍稍暗示一下  
就可以长年累月地把你关进漆黑的牢房  
他可以让你死，死后还要蒙受耻辱  
他可以让你活，活又活得窝窝囊囊  
总之你是他的奴隶，他的臣民  
你对他的权威不能有半点违抗……

呵，人们，你们可曾看见  
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也许你无法辨认，即使他就在你的眼前  
因为他象个魔术师，不断地变换形象  
一会儿，他穿着金丝织绣的龙袍  
手持着象征权柄的龙头拐杖  
一会儿，他穿上马蹄袖的朝服  
大摇大摆地走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上  
如今，他居然又涂上了新的油彩



穿上了时兴的服装  
不过，无论他怎样改头换面，乔装打扮  
却遮掩不住裸露的屁股上烙下的龙图象

噢，中国，古老的国度，神秘的土地  
你古老犹如你的长城，你神秘犹如你的象形文字  
犹如你的木犁、纺车、水碾和那藤条的箩筐  
你有那么多的墓地、古塔和庙宇  
那么多的宫殿、圣物和祠堂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是神的故土，鬼的家乡……  
而我，一个北中国的儿子  
就是在恐惧里诞生，在虔诚中成长……  
哦，童年，那个可怜的童年  
那个凄凉的村落，那间破旧的草房  
我裹着一条破烂的棉絮  
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  
呆呆地望着那熏黑了的墙壁  
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神的画像  
关帝爷威风凛凛地坐在虎皮凳里  
观音娘娘坐在海水中的莲花盆上  
老寿星倒是笑嘻嘻的望着我  
但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慈祥  
桌子上有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  
妈妈说，那是众神之位，至高无上  
当妈妈把三柱香插在香炉里  
我总是远远地跪着，不敢抬头张望  
晚上，我常常做梦，梦境里烟雾缭绕  
一会儿梦见地狱，一会儿梦见天堂……  
这就是我的童年  
小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神的形象  
我觉得神是万物之主，他无所不在  
就连那门前的老槐树也透着神的灵光  
灾荒之年，我曾跪拜在烈日之下  
闭目合掌，祈祷那万能的冥冥上苍  
尽管我对神是那样的虔诚  
生活依然贫困。大地照旧凄凉……

啊！古老的旧中国呵，多么可怕  
一个幽灵在广袤而荒寂的大地上游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沸腾的晚上  
打谷场上照着朦胧的月光  
我们站在红旗下，第一次学唱《国际歌》  
发誓说：不再要神仙，也不再要帝王  
就是那支歌，唤醒了我们麻痹了的心  
使我们懂得了人的价值和力量  
就是那支歌，成了我们的口号和战斗的旗

手拿梭镖，赤着双脚，走遍了中国的平原和山岗  
就是那支歌，使我们忍饥挨饿，万里迢迢  
从长白山、太行山、一直打过了黄河、长江  
就是学了那一支歌，一句口号，一个诺言  
我们才用滴血的手臂托起了一轮太阳……  
当那古老的宫殿，阴森的庙宇倒塌崩溃  
红色的旗在中国的晴朗天空飘扬  
我们象孩子一样，留下了喜悦的眼泪  
忘掉了以往的痛苦和忧伤  
但欢快的日子，多么短暂呵  
渐渐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感到了失望  
我们原以为我们是生活的主人  
可以快乐而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可是，我们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钉”  
被紧紧地拧在一架钢铁的机器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或者像一颗颗的白子和黑子被搁在围棋盘上  
徒有一个血肉之躯，一个会思考的脑袋  
却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  
可悲呵！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们的天职似乎只是举手或鼓掌  
对于错误与过失，我们原谅过  
我们想：革命不是在大街上散步  
涤荡污垢的潮水总不免误伤一些船只和住房  
这也许就是我们不幸的天性  
总是这么天真这么善良……  
然而，我们毕竟是人  
我们的大脑毕竟还有思想  
我们终于发现  
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为在建造社会主义大厦  
到头来才知道盖得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

呵，人们，就在我们昏昏沉睡的时候  
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热病流行的年头  
我回到黄河古渡的一个古老的村庄  
那里有当年的革命保姆-----朴实的贫农大娘  
三十年别离，重又归去  
我想，古老的村落早该是改变了旧时的模样  
不错，村子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年老的早已躺进了坟墓，年轻的已是双鬓染霜  
树枝头悬挂着一个高音喇叭  
从早到晚，传出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叫嚷  
我走进每个家庭，不见了门神、财神和灶君的年画  
但家家户户却又供起了新的神像  
当年的游击队长早已苍老了  
刻满皱纹的脸上充满了忧伤

他睁着一双呆滞的眼睛，歉然地对着我说：

“三十年重聚，我们俩该痛饮一场

可惜呵！红海洋淹没了 我的菜园

连几根葱子、蒜苗也被扒光

人家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是繁殖私有制的土壤……”

这一夜，我无法入睡，想了很多

心理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对养育了我们的乡亲，该怎么说呢？

想起三十年前的承诺，我实在羞愧难当

该怎么说呢？

推倒了三座大山，难道是为了修建另一座庙堂？

烧毁了财神、菩萨，难道是为了挂起新的神像？

……

呵，中国，古老的中国，神秘的中国

多神的中国，神话的摇篮，君权和神权的温床

你有那么多的庙宇、宫殿

那么多的帝王陵墓

难怪总是有幽灵出没、借尸还魂

你广袤的疆土实在是一片繁殖封建的土壤

有人说，小农经济会繁殖资本主义

不！军权、神权简直是根深蒂固

封建的堡垒里怎能让新的阶级成长

我们谁见过资本主义？

它是个早产儿，刚躺进摇篮就已被绳索捆上

中国呵，像一条巨龙能吞噬一切

它能同化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

你不见非洲、美洲的狮子么

他原本粗犷、勇猛，是大森林的兽中之王

一旦到了龙的故土，竟被铜环锁住鼻孔

象看家狗，守候在衙门、宫殿的大门两旁

呵，中国，我们亲爱的中国

你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鲜空气

需要风，需要雨露，需要阳光

需要改造那散发着腐霉气味的土壤

呵，中国，可怕的不是喇叭裤，不是长头发

不是邓丽君，也不是“拉兹之歌”

可怕的是古堡里的那个幽灵

它正游荡在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上

1980年10月写于成都

#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李国元

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的大游行中有一个方阵，抬着一个大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条标语口号，很熟悉，又似乎久违了。

其实，说熟悉，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熟悉。40岁以下的人，未必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演变。即使是5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也未必能把这个东西说清楚。本人蠢活了一又四分之一个甲子，不揣冒昧，向年轻人说一说我对这条标语口号的认识。

我在学生时代见到的标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这个专有名词的原创者是刘少奇，后来在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作了规范化的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规定：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也有的标语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那时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简单而具体，就是“毛泽东脑袋中的思想，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战无不胜的。

后来看到曾经被誉为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这样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哇塞！我才知道毛泽东思想这么厉害，可以指导世界革命了。林彪还有更高的赞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还说过：学习革命理论的“捷径”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只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就够了。

怎么样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呢？他又说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些都说明毛主席著作、讲话、批示，就是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一切讲话、批示、指示都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称其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诸如：“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考试是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形势大好，好的标志，就是乱了。有的地方乱得还不够……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七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人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读了几十年的书，越读越蠢”；……等等，这一切都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圣经”。

所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都怀揣一个小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报纸也常宣传：某人工作中遇到困难，掏出“红宝书”，念念有词：“下定决心，不

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困难克服了，任务胜利完成了。连打乒乓球赢得世界冠军，也是靠毛泽东思想指导的。

林彪还曾经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后来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学习，该讲话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即使毛泽东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日夜思考的东西，林彪都心领神会了。

所以，那时有人吹捧林彪，说他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最深刻，不是毫无根据的。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抬高、神化到如此地步，自然就不许人们对其有一点“异议”，若有一点“异议”，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所以，刘少奇被打倒以致整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即便你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原创人，只要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该诛、该讨还是免不了的。有趣的是倡议“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林彪，也因此落得被诛、被讨的下场。

其实，林彪一背转身，却对他的死党分子们说：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阶级斗争理论、国家机器是“绞肉机”。

后来，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毛泽东关于林彪的拍马屁也只是有一点否定，说：“一句就是一句嘛，怎么能顶一万句呢？”

“句句是真理”还是不能否定的。张志新认为毛泽东违背了马列主义，就被处死。处决前还要将其喉管割断，以防喊出对毛泽东不利的话语。

然而，真理不可能永远被暴力奴役。毛泽东一死，即便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要把毛泽东宠信的“四人帮”抓起来。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乱糟糟的，怎么办？华主席可没有毛主席置八亿人民生死于不顾的“魄力”，只有把“人才难得”的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用“铁腕”来全面抓工作。

于是，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吗？必须全部照办吗？如果说：“是”。那么，抓“四人帮”、起用邓小平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甚至可以说是反毛泽东思想。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邓小平想出了一个说辞：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要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显然太勉强了！理解得再完整、准确，也不可能把“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理解成“要重用邓小平”。

还是胡耀邦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他组织了一支理论队伍，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当然是“真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的著作、讲话、批示概莫能外。

首先检验的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

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们概括为：“政治上伤害了近一亿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倒退几百年的大浩劫”。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彻底破产了。

不但“文革”经不起检验，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基本上都经不起检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伤害了100多万知识分子；1958年的三面红旗，饿死3700万农民（相当于挨了450颗原子弹呀！）

这就给“毛泽东思想”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党的七大以来一直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该如何解释？

终于有人想出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凝聚着蔡和森、瞿秋白、高君宇、邓中夏、周恩来等人的杰出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宝库里最闪光耀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它同样包含着恽代英、周恩来等的思想智慧。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陈云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实践中，写了许多经济论著，为毛泽东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意：这里，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了，是集体智慧结晶；而且，把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许多著述、讲话、指示都不提了。

于是就有人进行了归纳：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早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晚年的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

有点像“绕口令”吧？晕不晕？我想：不这样“绕”，是不好“万岁”的。

其实，1949年以前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有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时期，毛规定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共产党打的有名的战役就只有“百团大战”和“平型关战斗”。其余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即使是这两个战役也受到毛的严厉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的打局部的

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

“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

因此，1937年共产党的军队总共不超过3万人，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迅即派部队赶往各个敌占城市受降，抢夺胜利果实。但是毛泽东却说：蒋介石不为桃树浇水，“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现在下山来摘桃子。

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很多资料可见，恰恰是毛泽东坐在延安清凉山观虎斗，积蓄力量等候摘桃子。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做了什么？最有名的事是“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前者是把大批（受到欺骗宣传）到延安的抗日青年打成特务；后者是批判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批判王明、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真正在“浴血抗战”，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毛泽东在延安一面整抗日积极分子，一面玩女人，玩吴莉莉、玩史沫特莱，然后抛弃贺子珍和江青结婚。

到了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还再次算旧账，说“百团大战”是帮了敌人的忙。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看到上述那些事，我们再看下面毛泽东的言论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毛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佐佐木表示歉意：“今天听了毛主席

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立即回应道：“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表示感谢。毛回答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533-534）。

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正式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次公然表示了这种思想。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竟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强大？我们怎么能夺权哪？怎么能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竟然进而表示要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

不必多说了，究竟是抵御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重要，还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重要？我想，凡是爱我中华的中国人，都是分得清楚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是分得清楚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货色也就清楚了。

（2010-12-3）

~~~~~

## 一对夫妻记者的遭遇

韦鼎、黎素芳口述 谭松整理

**韦鼎：**我们夫妻俩50年代都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记者，我们在工作中相识、相爱、结婚。1957年，我们已经有三个小孩，老大6岁，老二2岁，老三10个月。

大鸣大放期间，我提了几条意见，其中一条针对社长廖XX。廖XX夫妇都是十四级干部，工资相当高，但他却自己给自己加补助，拿更多的钱，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条意见，把廖XX惹火了，他一步一步地收拾我。

他先翻我的历史，一口咬定我是假党员，解放前混进党内的坏分子。他组织大字报烧我，开批斗会斗我，先把我搞臭。

**黎素芳：**廖XX亲自找我谈话，他说：“小黎，有件事我不得不把真相告诉你，你的丈夫是个假党员，他解放前的历史很复杂，证明他入党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国外，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个阶级异己分子……”

廖XX坐在我面前，很严肃很认真，他就是组织，他就是党。那个年代我非常单纯，认为组织最可靠，党最可信。我想，党组织一定是通过调查，掌握了韦鼎解放前的真实情况才会这样说。我心里好难受，我很爱他，感情很深，但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编造自己的历史呢？我回到家里对韦鼎说：“你不是党员就算了，对组织讲清楚，承认错误，我们安安心心过小老百姓的日子。”

**韦鼎：**廖XX接下来以劳动锻炼为名，安排我去南岸一个干部农场。三个月后，他又说，你暂时到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回来后继续工作。我到长寿湖三个月后，廖XX以新华社党组的名义，给农场去了一封公函，通知农场将我监督劳动（即作为坏人），并且停发工



资，只发生活费15元。我傻眼了，我并没被划为右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境地的？

**黎素芳：**廖XX来动员我同韦鼎离婚，他告诉我，离不离不是个人的生活问题，而是忠不忠于党，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还说：“你看人家周邦坤（新华社右派王华东的妻子），丈夫一划右就离了，这就很好嘛，你要向她学习……”

我精神压力大得很。要我揭发韦鼎，我不晓得他如何反党，说不出，批判我，说我右倾。开会时我给另一个右派王华东倒了一杯开水，就是划不清界线，也要批判我。不离婚，更是一条罪行。我对韦鼎有感情，舍不得，但看到三个孩子，又担心他们的前途。我是一边哭，一边写离婚书……

（黎素芳泪流满面）

**韦鼎：**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纸判决书送长寿湖。我把判决书狠狠摔到地上。

**黎素芳：**离婚两年后，我被调到重庆二十中学当老师。那是最困难的日子，我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儿子正吃长饭，饿得哇哇叫。

饥荒年有一种糠做的饼子叫“糠复元”，儿子舍不得一口吃完，每次只咬一点点，不料化学教师的儿子看见了，翻窗进来把“糠复元”偷走了。我大儿子很懂事，很关心两个小弟弟，有一次他捉到一只大青蛙，舍不得吃，煮起一锅清水汤，把青蛙煮了，分给两个弟弟吃。

有人见我日子艰难，劝我再找个人，我不干，我这辈子就算了，不愿再当妻子，只想一心一意把母亲当好，把三个娃儿养大。

**韦鼎：**1960年，我在长寿湖打二锤，每月19斤粮，没多久全身浮肿，头脑糊涂了，尿拉在裤子里。我们睡通铺，早上醒来，身边经常有人永远起不来。有一个从南桐转来的语文老师，叫崔永禄，捉到一条毒蛇，他饿急了，连内脏都不取，宰成几节胡乱煮了一下就往肚子里吞，转眼中了毒，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死得很痛苦。是我亲自埋的他，埋在桐子沱。他那个枯瘦狰狞的面容比蛇还可怕。还有一个叫马成敏的右派，又病又饿，一头栽在猪圈里断了气。最惨的是一个叫李刚（音）的右派，投湖自杀后尸体浮起来漂到岸边，被一群狗拖上岸，撕咬得支离破碎。那个姓吴的党支部书记无动于衷，他冲着一个发呆的右派说：“长寿湖没盖盖子，要跳的尽管跳。”

长寿湖发现我不行了，让我回家探亲，我离了婚，彼此连信都没有，要探只能探浙江老家。没路费不说，我也不愿父母见我这个样子，我想，我不跳湖，气要断就断。

1961年，我到湖边一个生产队劳动，在一个荒坡上种了一些红苕，当年产了几百斤，那几百斤红苕救了我的命。

从死亡边缘走过来，特别想去看一眼儿子和黎素芳，这条命说不定哪天就由别人来埋了。五年来，我怕影响他们，不敢同他们通信，我带了几张娃儿的照片，天天看。我要是死了，他们不会晓得。

1963年，我给孩子买了几个高价饼子（五角钱一个）回到重庆，我已经整整五年没见到他们。

他们已经搬了家，我找到新家，黎素芳不在，只有几个孩子。两个小儿子不认得我，冲我叫：“叔叔，把你那个纸烟盒送给我。”

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感到不安，呆了不到两小时就走了，没有勇气等黎素芳回来。

**黎素芳：**我见到韦鼎时已经又过了五年——1968年，他第二次回重庆。

他提了一条大鱼，有二三十斤重，到二十中找我。那年重庆武斗打得凶，我带几个娃娃逃到了大溪沟。二十中一个右派老师告诉他，我住在马家堡，他找到马家堡，没人，到处打听，最后在大溪沟找到我和孩子。

孩子们看见这么大的鱼，高兴得不得了，围着鱼团团转，但是不叫他爸爸。我不敢说话，我已经被划为四类分子，又回来一个五类分子，政治压力大。从1958年分手，我们10年没见面了，但是我不敢留他，心里怕得很，怕有人去汇报。我们在外面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他闷闷的灰溜溜的不说话，饭一吃完扭头就走。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他没回头，我想他心

里一定很难过，10年了，有家难归，好容易见面，不敢住一晚。他背影消失在黄昏里，我泪水往上涌，但孩子在旁边，我拼命忍，忍……

（黎素芳第二次泪流。）

这次见面，唤回了我对他的全部感情，而且，还增加了很深的怜悯。我忘不了他在黄昏中独自离去的背影，他太可怜了。当年我离开他是为了孩子，离婚后孩子仍然受歧视，别人骂他们是反革命子女，同没离一个样。我大儿子考初中，不准他按成绩读好学校，只准读最差的民办校——我们叫板板校。他的班主任王老师为他哭了，我也哭。我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离？

还有，这时我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非常单纯，压根没想过共产党会整人，毛泽东会整人。他们在我心中很神圣：解放全中国，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文化大革命让我清醒——原来共产党毛泽东要整人！

我决心要帮他！

我到处找人，我到成都去找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孙振告诉我，韦鼎的档案是清楚的，说他是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没有任何实证，整他的材料上只有廖XX的一个个人私章。孙振承认这是个错案，但是他说，韦鼎的事出在1957年，1957年不好改，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有，川东地下党的案子很多，改了你韦鼎一个，其他人来闹怎么办。所以，干脆不动。

从1968年起，又过了五年，1973年，韦鼎第三次回渝探亲。这次我实在不忍心再看见他无家可归。

韦鼎坐在家里，我把弟弟和大儿子叫到外面的山坡上，问他们怎么办，留不留他。弟弟说：“姐夫是个好人，把他留下来。”大儿子也说：“妈妈，把爸爸留下来。”

他们表了态，我当然很高兴。

当天，韦鼎没有走。

韦鼎：我终于又有家了！从1958年到1973年，整整15年，小的两个儿子不习惯，不叫我爸爸，只叫“他”、“他”、“他。”

黎素芳：当年暑假，我到长寿湖去同他复婚。这是我第一次到长寿湖，他到狮子滩来接我。我一眼看见他，惊呆了：他破破烂烂，疲惫不堪，站在那儿像个流浪汉、叫花子（乞丐）。他身上穿那件府绸衬衫，还是我1957年给他买的，又旧又烂，补丁加补丁，大热天，脚上穿一双裂口的全胶元宝鞋，下身是一条破旧的劳保裤（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下放干部扔了不要的），我坐在车上，当场就哭起来。

到了团山堡，看到其他“分子”个个跟他一样，都是破破烂烂。

他们回渝探亲，穿的是最好的衣服。

在团山堡，我住了一个暑假，亲眼看见他们劳动，我心都碎了。韦鼎从湖边扛大包上山，腰压得弯成直角，像个动物在地上爬，就像我在电影上看见的非洲黑奴。

（黎素芳边说边跳起来演示，她伏下身子，双手向后朝上伸直，一步一步挪动脚。）

我不知道他15年过这种日子，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韦鼎：其实，那个暑假我过得非常幸福，有家了！

黎素芳：从长寿湖回来后，我继续上访，跑成都，我要洗清他的冤屈，救他回家。

整他的廖XX文革前调到成都。他整人的恶习不改，到文革时，前前后后被打成各种“分子”的有10余人。文革一来，他自己也被整，亲自尝到了被斗、被下放劳动的滋味。

他不向我们道歉，他看见我来上访，赶紧避开，尽量躲着不见面。他妻子林XX这时也尝到当一个“分子”家属的痛苦。在成都，天冷了，我穿得单薄，她抱了一抱衣服，来到我住的招待所，非要把衣服给我。我当时心里满是怨气，坚决不要，全部退给她。

10年后，1984年，我同林XX在育才中学又见面了，她是育才中学的学生，回来参加校庆。她给我送来10个广柑，很诚恳地说：“过去把你们整得很惨，很对不起。我们都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老廖后来自己也挨整。”我冲着她说：“那不是一天、两天，而是10年、20年呐！那些年我们过的是什麼日子？！你男人平白无故污陷我男人，他差点儿死在长

寿湖……还强迫我离婚，害得我们夫妻分离15年。我一个人拖三个孩子。你也是女人，你也有家庭……”

林XX突然哭起来，边哭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一哭，我也哭起来，我们两个痛哭一场。

分手时，她要把广柑留给我，我不要，她坚持要给，最后我们一人分了五个。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6日、2002年1月8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 采访后记

一大早，挤上中巴，从杨家坪赶往江北。412路中巴车清一色的破烂，一路上黑烟突突，走走停停，抵达江北，已去了一个多小时。

没人知道新华社的宿舍在哪儿，左右两边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正在闹哄哄地搭建城市“物质文明。”

待我终于在韦鼎老人面前坐下，抬眼一望，墙上的钟已指向9点40。

我急切地望着老人。

刚开了个头，他妻子黎素芳倏地从厨房里奔出，三两步奔到面前，噼噼啪啪抢着说，一边说还一边不时地表演，十分生动，当然，说到伤心处，泪水滚滚涌出来。

我蓦地惊觉：一个“分子”家属所遭受的苦难，不会亚于“分子”本人。

果然，为丈夫的苦难痛哭，为儿子的升学痛哭，也为另一个女人的道歉痛哭。一个漂亮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就在涟涟泪水中过去了。

该怪廖XX吗？也许该。黎素芳说：“去年廖XX带口信来，向我们夫妻问好。他可能有悔意，但我不原谅他。他不是在大气候下的无奈，而是因私利蓄意整人，这是个品质问题。”

这话自然有道理，但我总想起20多年前在杂志上读到的一首诗，大意是：海浪啊，你们，你们都是些风的俘虏……，他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一阵咒语，你们如痴如狂，扑向同类，把厮杀当成欢乐。……广阔的海洋，变成角斗的广场，拼杀到岸边，什么都没留下，只有眼泪组成的泡沫……

---

## 唱了几首歌，坐了20年牢

诸溪口述 谭松整理

1949年，我进入新社会，50多年来，唱了几首歌，坐了二十多年牢，劳改前后25年，然后退休吃闲饭20年。这一辈子，怎么说呢，我被坏分子打成坏分子，被盗窃犯打成盗窃犯，被扒手污成扒手，这个新社会呀……

我是南京人，1926年生，出生于一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之家。父亲是大生意人，11岁那年，日本人打来，我们家产全部被毁，父亲病亡，母亲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家里仅剩我和祖母，所以我这一辈子都痛恨日本人。我在沦陷区长大的，有强烈的爱国心，一心渴盼国家强大，富强。我觉得国民党腐败、独裁，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所以，1949年我坚决不跟舅舅去台湾，而加入了共产党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政文工队当独唱演员。

我第一次坐牢是1952年，那时我们驻扎在四川简阳，队里有一个采购员自杀了（当时搞三反运动），尸体是一个叫王振东的小演员发现的。上面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抓起来咬定凶手是他，王不承认，不承认就押出去枪毙，王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承认。但是一押回来，马上翻供，又押出去，王又赶紧承认。说他是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中统特务，军统特务，都承

认。王虽然承认了，但上面觉得他只有17岁，还不成熟，背后一定还隐藏有老奸巨猾的特务。当时同王接触得比较多的一个是乐队指挥安啸北，他教王拉胡琴，另一个就是我，教王唱歌，我们有时晚上就在花园里练习。他们不由分说，一把把我们俩抓起来，脱掉军装，穿上黑衣，关押入牢。你听没听说过当年在苏区抓AB团？就是那种模式，平白无故认定你是特务，设一个套子诱你往里钻，用各种手法逼迫你承认。比如半夜三更把人提起来，劈头问：“姓什么？接头的是谁？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还有什么话说（指遗言）？”等等。共产党有个很坏的作法，不问青红皂白先认定你是坏人。他们给我带上手铐脚镣，威胁要枪毙我，我知道他们做得出来。我要来纸和笔，准备给我在南京的祖母写信，也算遗书吧。我拿起笔突然不知怎么写，说我是冤枉的，信寄不出去，说我犯杀人罪被枪毙，那还不把我祖母气死？！我越想越气，越想越冤，干脆不写，那天我豁出去了，慷慨激昂地冲他们嚷：“我诸溪不顾一切留在大陆，抛弃工作，参军入伍，是一心一意要跟共产党走，我那么热爱党，那么热爱毛主席，你们非要把我整成敌人，整成特务，杀吧，杀，杀了把我的心挖出来看……”

我原本是歌唱演员，声音宏亮，又是生死关头的叫喊，这还真把他们震住了，所以后来宣布王振东、安啸北死刑，我则暂不枪毙，说是还有重大问题。死刑还未执行时，部队开赴朝鲜，我们被解押到省军法处，这救了我们的命，因为他们终于弄清了采购员确系自杀，我们被放出来时已是1953年年底，共坐了22个月的牢。我们中最不幸的是安啸北，他有妻子儿女，精神压力极大，他在牢里大叫：“张XX（他妻子），我没得事，你要把娃儿带好。”放他出来时，人已经疯了。他挨打呀，给他戴一种叫“童子拜观音”的刑具，那是两个铁圈，一头勒住脖子，一头铐住双手，中间一根铁棍固定，戴上这种刑具，双手不能往下垂，稍微一动，颈子就痛得钻心。

仅管遭此牢灾，我对共产党、毛主席仍然非常热爱，非常崇敬，仍然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你刚才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出狱后不久照的，你看那精神！

195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重庆歌舞团当了一名独唱演员，不久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妻子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个演员。

1957年我没有鸣放，也没把我打成右派。1958年底，歌舞团舞蹈组的组长来通知我，说组织决定我下放农村劳动，没说任何理由，也没说劳动多长时间。那时的人很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背起被盖就去了。

在南桐农村，我才知道我已经被开除公职，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了。犯了什么罪，我一无所知。我回去问，歌舞团的人厉声呵斥：“你自己的事自己还不清楚？！”

后来，我清楚了——那是20年之后。

在南桐，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饿得惨呐！“大跃进”越深入，饿死的人越多，到最后我们靠吃红苕叶子充饥，我们那一带青壮年饿死很多，因为他们要劳动，需求量大。

1960年，我同南桐的右派分子、历反分子一起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我定量是每月17斤粮，这点粮根本不够，我水肿，走不动路，于是派我到新滩去照守参子鱼。新滩是个斜长的水滩，参子鱼喜斗滩，我们抓住鱼的这个特点，在滩上挖了一个水坑，鱼斗滩上来落入坑中，我们守株待兔，每天收获上千斤。

同我一块照守的是重庆日报的右派詹光。新滩队的党支部书记叫陈XX，是长航来的干部，他经常把鱼批给他舅子，名义上是买，记得每斤是2角3分，100斤就是23块，运到城里去油炸了卖要4、5元一斤。他舅子拿张交款收条来，在我们面前晃一晃，用挑谷子的大箩筐装上满满一挑，说100斤，弄走的不止150斤，这还不算，他条子不交给我们，下一次用同一张条子晃一晃，又弄走一挑，如此反复多次。詹光看在眼里，不吭声。有一次，我忍不住，很委婉地对他说：“你还是适当点，你弄多了，我们说不脱。”

陈的舅子瞪了我一眼，走了。

不久，在捕鱼队煮饭的右派孙静轩赶来告诉我，要我当心点。他说，听见陈的舅子对陈说，诸溪这个人装怪。陈书记回答，装怪不要紧，他不听话就收拾他。

孙静轩叫我回家去看看妻女，万一被“收拾”就回不了家了。她的前妻是铁路文工团的

团长，同我妻子熟。

我赶紧请了三天假，匆匆回了家，然后又回到长寿湖。逃跑？哪里敢？而且，没有钱没有粮，又没有证件，往哪里跑？

有一天，陈书记叫我到狮子滩去学习，我去了。进会场一看，杀气腾腾。不一会，有人高声宣布：“诸溪犯盗窃罪，盗窃国家财产鳊子鱼2万斤，判三年劳教！”

立马有人上来把我五花大绑。我虽然知道要被“收拾”，但那一刻还是把我骇昏了。同我一块被抓的有36个人，名字记不得了，因为我被吓得昏头昏脑。

我先被押到沙坪坝松山劳改转运站，然后被押送到北碚西山坪劳教所。我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我被打成了盗窃犯，判了三年刑。这儿说说我妻子。她跟着我受苦啊，因为坚决不同意跟我离婚，单位惩罚她，把她下放到内江火车站打扫厕所。我被抓后，在更大的压力下，我们离了婚。离了之后，她的待遇马上提高了，从打扫厕所改为在火车站卖票。后来，她带着女儿改嫁了，女儿改了姓，不再姓诸。还有，我南京的祖母靠我赡养，我入狱后她断了生活来源，很快就去世了。

我在西山坪同扒手、小偷、妓女们关在一起，所谓扒手、小偷都是因为饿得要死，忍不住偷了一点东西，比如偷了几个馒头或者摸了人家一、两块钱，其中大多数是十多岁的娃娃。至于妓女，就更冤了，那些女人饿慌了，给碗稀饭吃，就献身，这就算作卖淫。

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关进来很不服气，大多不认罪。劳改所的干警想让他们认罪服法，于是找到了我——他们认为我有文化，有舞台经验，要我编剧、编歌来教育他们。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材料，据此编剧。比如，有人摸了一个老人的两块钱，那两块钱是老太婆给她孙子买药的，老太婆很穷，丢了钱，买不了药，孙子发高烧死了，所以，偷两块钱也是大罪。

另外我还编歌，组织劳教人员演唱。什么“认罪服法……”、“逃跑无出路，害人又害己”等等。在劳教所我的这点“文艺才华”使我少受了许多苦，相比其他犯人，日子要轻松一些。

三年期满，我被释放，但我已无处可去，家没有家，工作没有工作，户口都办不了，只好留在劳改农场当一个就业人员。没过多久，一年吧，我又栽进去了。起因是这样的，劳教所有一个留场人员叫王XX，当时十六、七岁，他因扒窃入狱，刑满后也留场。在一次上街赶场时，他又去摸人家的钱包，结果被抓住，送回来后他很害怕。一个叫柴XX的人教唆他：你就说是有人怂恿你去干的，这样就会从轻发落。王于是一口咬上我。我同王关系很好，把他当干儿子，教他文化，教他唱歌。王咬我之后，我被抓出来当作扒手的黑后台批斗。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发了疯地大抓阶级斗争，大抓所谓的反党集团，这件事被一层一层上纲上线：诸溪为什么要叫王去摸包，因为诸溪需要钱，要钱来干什么，因为他仇恨共产党，要组织反党集团，组织反党集团需要经费，诸溪自己担任反党集团首领……，那个年代只要说发现了、破获了隐藏的或者潜在的反党集团，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伟大胜利”，办案人员就要立功。至于是不是事实，则没有人去管它。就这样，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又判了三年。不过王诬告我也没有滑脱，同样判了几年。多年后我们相见，他连连向我道歉，说昧了良心，恩将仇报。现在他已是一个大老板。

那些日子很难过啊！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见得多了，死人太多太多。一种是专政机关给你定个罪，抓起来就枪毙了。比如有一个姓周的右派，以前是从白公馆跑出来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劳改队被枪杀了，我亲眼目睹，临刑前他想呼口号，后面的人勒紧捆在他脖子上的绳子，他一声都没哼出来。这个冤案至今没平反，现在有一个叫吴明的很有正义感的法律专家在帮他申冤。

我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歌舞团有一个叫马维聪的男高音歌唱家，一米八的个头，仪表堂堂，是团里的主力演员。饥荒年，他人高马大，饿得发昏，万般无奈中只得去偷。他穿戴整齐，气宇不凡地走进商店，叫服务员把一部高档相机给他看。他左摆弄右摆弄，乘服务员不注意迅速调包，在皮套里装进一部旧相机还回去。得手后他将相机换成粮票，吃进肚里。不多久，他又故伎重演，但这次他失手了，被抓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他死活不肯

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一直拖到晚上8点多钟。为什么要拖到8点多钟？因为当天晚上有他的演出《货郎与小姐》，他是剧中的主角，男高音。他突然失踪，剧团只得宣布退票。8点多钟，马维聪估计观众都走完了，才供出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他被押回来接受批判。这事本来认个错，写个检查也许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团里的台柱子。问题出在他死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说：“我错了？全世界的男高音歌唱家有哪个像我，饿得被迫去偷？！这不是我的耻辱，是这个社会的耻辱，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

本来偷点东西是品质问题，马维聪居然敢指责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要用其它手段来解决了，于是，马维聪被公安抓走。

在劳改期间，其他犯人晓得他歌唱得好，不时叫他唱支歌，马维聪也放得下脸，说：“要唱可以，拿一块红苕来。”

不料，这又给他带来了灾难。马维聪不唱革命歌曲，不唱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而专唱一些民歌，民歌里少不了“哥呀妹呀”的，于是又有人去汇报了。那个年代呀，告密者满街都是，整个社会已经被扭曲了。在他劳改地的山坡上有个女管教，民歌里有句“妹在对面山坡唱”的词，于是，马维聪被诬为“调戏女管教”。

当天，马维聪被批斗，挨打，随后，罚他到山上干重体力活——背南瓜。

第二天，马维聪从山上背满满一背兜南瓜下山，由于饥饿，头天又挨了打，他体力不支，一跤摔下去——

山上有很多竹子，农民砍了后留下一截截尖利的竹桩，马维聪不幸一屁股坐在几根竹桩上，竹桩从他屁股刺入体内。马维聪被钉在竹桩上，动弹不得，大山上，喊救命也没人听得到。

当晚，劳改队的人不见他回来，以为他逃跑了，派人搜山，发现他的遗体。

他还端端正正地坐在竹桩上，鲜血浸透了地上的泥土……

马维聪的妻子也在歌舞团，是大提琴手，他们夫妻有才有貌，女的拉琴，男的唱歌，是个非常美好的充满艺术和恩爱的家庭。

就这样给毁了！

还有，唆使犯人打犯人。比如要收拾我诸溪了，就说，今天晚上开诸溪的批斗会，开会时监管人员自己是不动手打人的，但他们想要打谁，谁就在劫难逃。他们确定好了要打的人，然后授意下手的犯人，开会时借故离开现场，丢下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其实这就是动手打人的暗号。过一阵子，监管人员估计打得差不多了，又返回现场，责怪说：“咦，你们怎么动手打人？停下来！”这场虐杀这才告一段落。

那个日子不堪回首啊，真的生不如死，求死不得！我好容易熬过了三年，又给我加刑三年！

劳改队每年都要对犯人进行评审，看是否改造得好。我每年都一样，两个优点两个缺点。优点一是劳动积极，吃苦耐劳，二是遵守纪律，外加从不逃跑和企图逃跑（我往哪里跑？）；缺点一是“不靠拢政府”，二是不认罪。“不靠拢政府”你可能听不懂，那指的是“不告密”、“不汇报他人的言行”。我以前在南桐农村劳动时，也是这个“缺点”。当时，我们这些“分子”又被管教我们的党组织在内部分为三等，一等就是“靠拢政府”，表现好——告密！你要想当“一等”，就得去整同类，从而活得轻松一点，总之，要逼你去作恶。“不认罪”就不用多说了，我既没有盗窃，也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怎么认罪？不认罪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我又被加刑三年。

我真的绝望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生，对生命的意义统统绝望了。我没有家，没有亲人，活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真真的一无所有，连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生不如死。我想自杀，想用高压电线自杀，也想投河，成天就想死。

说来救我的竟是一个管教干部，他叫XXX。一天，我坐在河边，正在想怎么死，他看出我不对劲，走过来，冲着我的屁股一脚，骂道：“你他妈真没出息！活不下去了？！嗯？站起来，走，活下去！”

这几句话还真激励了我：“活下去！”

1969年，我从西山坪转到永川劳改农场。这次转移，得力于一个叫XXX的监管股长的帮助，这事说来还有一段“佳话”。

有一个叫赵X的妓女刑满释放，股长把她推荐给我，他说，赵是扬州人，离我老家南京不远，如果同她结婚，出狱后就有家可归，而且是回老家。

长年累月在劳改队，性压抑可怕呀！一个男人几十年不过性生活，真的惨无人道，我怎么不渴望？不过，我也绝没想过这辈子要同一个妓女结婚。我拒绝了股长的好意，得罪了他。他骂我：你这辈子就呆在劳改农场，死在劳改队。可奇怪，他反过来又对我有了几分敬重。1969年，13军想要把西山坪作为后勤基地，所有劳改犯要转到四川峨边。我无所谓，孑然一生，去就去。股长叫住我，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峨边的情况？那儿条件差得很，十有八九活不出来，我安排你到永川劳改农场，那儿吃大米。”

就这样，我被“照顾”到了永川。

在永川，我帮人写检讨，写出了点名气，很多人都找我。要晓得检讨不好写，要写得深刻，使检讨人过关，不仅要有文字水平，更要有技巧，有时还得逆向思维。

（注：文革中，在重庆北碚区，有人专门从事代人写检讨书的职业，而且明码标价。分为“五角检讨”、“一元检讨”、“一元五检讨”、“两元检讨”几种价格，价格越高检讨越深刻。其中“两元检讨”就是保证检讨人过关的“最深刻的检讨书。”——长寿湖右派曾永臧提供。）

劳改队有个犯人称孙秀石，是个大学生，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有一次读报，他不知是走神还是精神太紧张，竟把打倒刘少奇读成“打倒毛主席”。

那一顿好打！然后勒令他写检查，他写了几十次都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挨一顿打。别人指点他找我帮忙，他找到我时已经被折磨得精神几乎崩溃，苦苦哀求我救他一命。

我说：“你几十次检讨过不了关，是方法不对。每次你都说是口误，走神，读错了，绝对没想要‘打倒毛主席’，结果一次次挨打。现在你干脆说就是想打倒毛主席！为什么？深挖阶级根源：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祖祖辈辈的家产被共产党强占，爷爷又被枪杀，所以你心底阴暗，仇恨新社会，必然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这是阶级本性决定了的，就像狗要吃屎……你要同意我就帮你写，包你过关。问题是你要敢当众念。”

他哭丧着脸说：“现在生不如死，还有什么不敢念的？”

我说：“也是，你已经劳改15年，早已是现行反革命了，还有啥怕的？”

他照我说的做，果然过关。

我帮人写检讨，不要钱，要一把挂面，或者两尺布票。在劳教所那些日子我穷得很呐，一个月干下来才发两块钱，又没有亲人接济，长年累月缺衣服穿，一年中有大半年赤裸上身，冷很了就找一条围腰裹一裹。由于长期赤裸身子，我背上长出一层一寸多长的白毛，雨水落在上面顺毛滴下，不湿皮肤。

我这条命呐，可以说是捡来的，也可以说是被逼到绝境上奋起“自卫”保存下来的。

那个年代，上面成天鼓动人揭发、告密，时时刻刻监视、控制你的思想，你的一言一行。我们出去劳动，有两个组长，一个负责劳动，监督完成劳动定额，一个监视言行，当天有没有人发牢骚，说“反动话”。每天收工后开批斗会，互相揭发。我用了个办法，也可以说是宝贵经验，任何人揭发我说了什么，我都作老实认罪状，全部承认（免得挨打）。然后说，他（揭发我的人）比我说得更多、更反动，我活龙活现的编造一通，比如说他告诉我他有个亲戚在国外，他拉我叛逃……这样揭发者也被拉出来批斗。嘿，这一招很灵，到后来没人敢揭发我了。

但我还是遭了一次。我曾对其他犯人说：猴子活蹦乱跳不好管，人们把猴子关起来，拿一只鸡当众一刀宰去头，血洒一地，猴子吓坏了，于是，每当有人来，其它猴子就把一只猴子往外推，到最后，剩下那只猴子也跑不脱。我说咱们要团结，不要当猴子。不知谁转眼就告了密，我被拉出来斗，我仍然运用法宝，不仅一概承认，更重要的是，从我解放前出生于



大资本家的经历讲起，一点一滴，有细节有血肉，逐一分析，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我不仅讲得非常深刻，而且讲得非常生动，劳改队里很少有如此高水平的自我批判和检讨，管教干部觉得是个好的教育典型，竟没让我劳动，白天整理批判稿，晚上安排我在各队检讨。一场又一场，直到后来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上了我的当。

劳改队暗无天日，要生存下来要必须费尽移山心力，其中之一就是要拉帮结派，遇到事，有没有兄弟伙的支持大不一样。有一次，我选了一个最喜欢告密的人，决心收拾他一下。一天，在早请示仪式时（注：文革中人们每天早晨要站在毛泽东像前向他请示问安、表忠心，晚上要向他汇报，这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我悄悄凑近他耳朵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那人如获至宝，马上汇报：“诸溪说反动话，他说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

当天收工后，开我的批斗会。揭发者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我很沉着地站起来问：“哪个听到我说这话的？”我那帮哥们齐声说：“没有，没有。”我又说：“你们听见哪个说的？”哥们争先恐后地指着告密者说：“是他，他说了两次，早上一次，现在一次。”我进一步煽动说：“XXX是假借检举呼喊反动口号，发泄心中不满，他是伪装积极，打着红旗反红旗……”

那个年代，就算重复反动口号，也是罪过。

于是，那个告密者被打得鼻青脸肿。

在获得平反前，我有过一次绝望的冲动。那是1979年，我在山上守庄稼。中队长赵胖子叫我给他喂十来只鸡，他来收蛋。这个赵胖子，当年从农村入伍，转业到劳改农场，当了指导员，因为奸污女犯人被贬为中队长。此人既贪婪，又霸道，我很鄙视他，凭什么要又出力又出粮替他喂鸡？！赵胖子见我不从，命令我马上下山，准备用重体力劳动收拾我。我背起行李下到山下，远远看见赵胖子的身子，这时，几十年的冤屈、苦难、悲愤陡然涌上心头。从1962年被抓进来，我已经在劳改队17年了，我究竟做了什么？把人往死里整？！老婆女儿早跟别人走了，我诸溪一个反革命，一无所有……

我突然失控，跳起来冲着赵胖子的背影一通臭骂，把他奸污女犯人的事也骂出来。这种“犯上”在劳改队是石破天惊的事，其他犯人起哄：“诸溪敢骂中队长，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我已经无所谓了，不想活了，活够了，活厌了！我继续跳着骂。这时，指导员来了，他与赵有矛盾，我这通臭骂正中他下怀，他冲我吼道：“诸溪，你发什么疯？！你给我滚回山上去！”

我于是又背着行李回到山上，赵胖子没能下手收拾我。

后来我多次想起那天的情景，想到那种绝望，那种豁出去了要拼命的绝望。每每想起，很感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要把人逼到无路可走，人如果不想活了不怕死了，一个个都是反革命了，你这个革命就危险了。

我告诉你一件也算是我的丑事吧。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我在永川劳改农场（茶场）一个叫云台寺的地方守打水房。因为山上缺水，要从山下抽水，再从我守的这个水房抽到山上场部。我虽然一直不认罪，但我不会逃跑，也不会干坏事，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守这个抽水房。

一个夏天，很闷热的天气，要下雨。大概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姑娘，十多岁吧，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她说：“我讨口水喝。”我说：“你喝吧。”她喝了不走，同我摆龙门阵（聊天），问我怎么来的呀。最后她说：“叔叔你给我两块钱吧。”

“我怎么给你两块钱？”我一个月才四块钱。我又问：“你要两块钱干什么？”

“我妈妈病了，发烧、发炎，要到川汽厂去打针，打青霉素。”

我还是不愿意。

她支支吾吾地说：“我跟你那个嘛。”

“你跟我哪个？”



后来我明白了，她可以跟我睡觉！

我二十年没碰过女人了，心里还是很高兴。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主动送上门来，而且只要两块钱。

她说着说着，看我这个样子好像是同意了，于是 she 就把上衣脱了。

唉呀！除了袖子以下是晒黑了的，她的身子像是汉白玉雕塑！我一个饿了二十年的光棍男人，一见到这个，呀，简直太美了，简直是个艺术品，一个维纳斯！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问她：“你爸爸呢？”

“我爸爸在东山。”

东山也是永川劳改队的一个大队——二大队。我们队在西山，场部所在地。我问：“你爸爸犯的什么罪呀？”她说：“也是右派，因为抗改造又判为现行反革命。”

我一听，脑子里“轰”地打了一个炸雷！我也有一个女儿啊！我女儿会不会也被逼得去卖淫？她爸爸是右派，我是坏分子，我现在也是现行反革命，管制三年又三年。

我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来残害同我女儿一样的人？！我女儿同她差不多大，我被打成坏分子时她才三岁。我说：“你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我不是禽兽，我不能残害同类！”

我骂我自己，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一个人？我自己都被逼得家破人亡了。

这时天上响起一个炸雷，下起了大雨。她不能走了。我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她早上吃了一点包谷羹羹，中午没吃饭。我说这儿有挂面，你下点面吃。

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我这个地方是两个山峰，中间一条独路可以到川汽厂，下大雨她不能走了，我留她，同她说话。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个小学教员，当了右派，不接受改造，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在东山二大队。

我想，还有比我更苦的人，一个小姑娘，为了两块钱，为了给母亲治病，跑到劳改队来卖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什么人，把国家、把老百姓害成这个样子？！她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

这个罪魁祸首是谁？！

1979年，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从劳改队回歌舞团找领导解决我的冤案，他们说我不属于“改正”之列，因为20年前没有给我定任何罪，罪名都没有怎么“改正”？

那我是为啥被开除公职，下放劳改的呢？

现任歌舞团领导赵发奎一番话，我才明白，原来我还是“因言获罪”。

当年我很想把妻子调到歌舞团，我妻子又会唱又会跳，调来既解决夫妻分居，又能干一番事业。可是领导不同意。没多久，我发现团长吴X的老婆XXX调进团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他老婆又不会唱又不会跳也能调进来？

就是这句话得罪了团长，他暗地里指使把我整成坏分子，驱逐出歌舞团。

吴X这个人才是个坏分子，利用职权搞了不少女人。

但是，歌舞团还是不同意接收我，他们说，坏分子的事不成立，但我还有盗窃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这两个罪名不解除，不能接收。

为洗清这两个不白之冤，我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地奔波呀，那个苦，一言难尽。又整整过了三年，才还我一个清白之身。

我回到歌舞团是1981年，我已经55岁，歌舞团安排我到伙食团煮饭，干了几十年退休。

今年我78岁，这一辈子快过完了。几个月前我在观音桥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差点儿一了百了，醒过来很是感慨：

我年轻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但是，我一辈子吃苦、坐牢。50多年来，唱了几首歌，坐了二十多年牢，然后退休吃闲饭20年。这一辈子，怎么说呢，我被坏分子打成坏分子，被盗窃犯打成盗窃犯，被扒手污成扒手，这个新社会呀……

（采访时间：2004年5月24日、6月7日、7月12日。地点：重庆市渝北区）

# 在长寿湖一次难忘的住院经历

它 山

几个孤儿院转来农场的崽儿，七脚八手把我抬到牛车车板上。把我的衣物连同好久没有洗又不成双的臭袜子塞进了稀眼大背篋，放在我的脑壳旁，就是赶车人小管坐驾的右手边。

牛车拉动了。侧脸望见面无表情的崽儿们的身影一晃而过，是一次再见还是诀别，这是无法预料的未来。抬头回望，再看一眼五间一排的木结构穿斗夹壁宿舍，这是 50 年代初建狮子滩水电站，修拦河大坝的采石场工地指挥所，那青瓦屋顶的一角也很快在眼前消逝。令人黯然神伤，我担心着自己不会回来了……..

## (一)

我是从南桐山区农村转移来的。能转到国营农场说这是组织的关心与照顾，提供更好的改造条件。改造好了，早日摘帽，回到革命队伍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来到这里不满一年。看来，我是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

当年从这里迁移出去十多万农户，钢筋水泥大坝截断龙溪河水蓄起一片汪洋，这就叫做“长寿湖”。沿湖设计的最高蓄水线之下的闲置地，包括湖内的岛屿山头都成为农场的地盘。我们“采石场队”就在大坝左边的一片懒洋坡大石滩上，湖边的退水农田庄稼地全由这个队管理耕种。

当时作动员转移的干部很会讲话，说农场里果树成林，站起身来就碰得着果子，大湖里的鱼随手就抓得住几条。不禁让我回味起解放前夕搞民主运动时唱的“山那边呀好地方，大鲤鱼呀满池塘……”给人带来的向往。

在局本部里我是被惩处最重的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生活费 7.5 元，只差开除工职送劳动教养一步之遥。我满心欢喜，生怕被留在农村。听说公社想留我下来继续搞测量，挖堰沟，兴水利。我尽量避开公社干部，怕节外生枝。

到这里，才知道果树还在苗圃里培植着呢，至今我还没有吃过一次湖里的鱼。

农场确实有一支捕鱼队，据说捕到的鱼都送到市里去了。在湖边常见的参子鱼，最长不过 8—9 公分。谁要去抓几条，被检举了，会遭到盗窃国家财产罪挨批斗。

四周的农民弟兄在夜间偷捕湖里的大鱼，跟农场发生过多起纠纷。最常见的是一个破斗笠撑在湖边，人躲在后面。抛出竹棍前端系有一米多长的鱼线，没有钩，只扎一个棉花球。鱼儿成群结队前来疯抢，刚刚咬住就被拖起一甩，掉在乱石草丛中蹦跳不已。农场的头头拿他们也莫可奈何。

有的晒成鱼干，每 10 条用谷草扎在一起，在当时所称的“背篋市场”上出售，才三四块钱一扎。我每月除了伙食费所剩无几，想也不敢想买来品尝一次。

这里的劳动强度之大，大大超过我在农村劳动改造的情况。

虽然，作动员干部的话应当是对农场远景的描述，但我们还是像坚信无限美好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那样向往着，只是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逐步实现。二话莫说，我下决心，好好劳动，大干一场争取早日摘帽。

大概是看我这个从农村转来的，还没有折磨得疲塌嘴歪的样子，保持着从里到外的正常状态。在农村两年，农民弟兄善待着我。常常抽调去写写画画，教识字，算工分，一般没有超强度的劳动。吃得很粗糙，甚至添加南瓜叶在饭里，却没有让我挨过饿。也许正是这样有些残存的精气神。农场便把我当作精壮劳力编在队里的水稻组。学会犁田打耙，栽秧捋谷。常常还要去抬石头，搞基建，挑运等等，重活都是我们包揽了的。

当时，普遍有一种不成文法却又理所当然的怪现象，身体好的、个子大的、长得高的都

是天生的干重活的料。但是吃口粮都是每人每月 21 斤，还照样要动员你节约两斤，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支援外省市地区。以至于在农村或农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挣扎之中，最先死去的死得最多的是精壮劳力，特别是个子高大的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这叫做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我虽不高也不大，只比一些人模样还正常，也年轻一点。在一群面带菜色，神情恍惚的老弱妇道面前，我不去承担重活，梭边边，隐隐然也是罪过，何况你想摘帽子超凡出尘，那么理所当然你必须付出更多更多。

我在农村搞水利常常得到照顾，队长打招呼，炊事员总会给我多打点饭，格外加点菜，我节约下粮票 20 多斤，到这里体力不支时也能补充一下。可是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停止使用。而我剩下的都是省粮票。天不亡我，人欲亡我也！匪夷所思，莫奈其何。

更莫明其妙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对农业生产提出“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号召，按照规定的方向，按照规定的行距间距插秧。栽出的秧窝必须前后左右看齐。顺看行行对直，横看窝窝对准。

荒唐的号召令人吃惊，而贯彻荒唐的号召更叫人可怕。先由党支部书记用指南针确定方向，意味着在党的领导下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吧，队长拉绳索规定行距，再命令大伙排在绳子前，比照绳子定的位置把秧苗插下去，同时看准左右的间距不可差错。书记队长在旁边指挥监督，吼上吼下，训斥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敢说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包括下放的党员干部沉着脸，累得青筋暴胀，也在所不惜要把各自面前的秧插到领导满意的一个样。

反反覆覆不知折腾了多少次。日以继夜，火把闪闪，烽火连天。每次返工又重新耙平水田的泥土面，累得牛儿口吐白沫不肯迈步大闹起牛脾气来，无人驾驭得住。队长只好叫牵回去另换头牛来继续战斗，牛儿甩着小尾巴悠哉游哉回去了。抗日时期的老漫画家高龙生悄悄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老夫虚劲颤悠悠，  
插秧日夜未曾休；  
通宵炬火继残夜，  
但慕眼前归去牛。

全队 40 多号人栽出了 4 分多水稻田。没有一窝秧苗挺直了腰干，垂头丧气飘浮在浑黄的泥水上。书记队长督战三天三夜，最后也莫可奈何只得首肯达标叫停。

随后，队长也是在担惊受怕中默许水稻组七八条枪，按照农村的老规格半月之内插满了从湖边到队部的一湾子梯田。其实不久水稻茁壮成长起来，才真的是绿油油的“一个样”。

扬花灌浆，丰收在望。大家担心附近饥饿的农民弟兄夜里会来搓谷吊吊，建议队上派人值班巡视。队长说这是好事呀，当即命令去提建议的组长派人守夜。不管你组上还担负着积肥运肥准备秋种的重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逻辑，你去报告门口有堆狗屎，也不管你正忙着做什么，他会叫你快去把它打扫干净。一番好心常常落得个自找麻烦，自讨苦吃的结果。

想来，我还真是个自作孽不得活之人。

为了要想早日摘帽，对我而言唯一能挣的表现是拼命劳动。若想从阶级斗争中去捞一把，自愧弗如。我自告奋勇值班守夜，免得晚上去开会搞阶级斗争。听说，别人守夜有窍门，我坚持睁着困倦的眼睛注视一切风吹草动，俨若边防哨听恪尽职守的哨兵，也从未被队上的明查暗访找到玩忽职守的任何问题。从天亮到上午 10 点补休外，白天照常参加劳动。

日晒夜露，睡眠不足，我逐渐感到四肢乏力。但还虚劲实足，收割、入库，不肯落于人后，我浑然不能自知正在走向何处？两眼模糊，分不清早晨与黄昏。

人们早已互相发现浮肿，但不能说，别人不说，自己也不敢说。有的说他自己浮肿，竟然遭到一个先期摘帽的右派分子硬说不是肿，是脸上长了肉。令人恶心的混账话，可以通行无阻，以及个别趋炎附势的小人随声附和，严厉批评散布消极情绪，瓦解改造信心，破坏三

面红旗云云。

列宁说过，哪怕是几何学的定理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必须推翻。也许这正是摘帽改造好了的标志，不惜睁眼说瞎话，捍卫三面红旗不倒的最高利益，个人的政治好处亦在其中。其实，不顾事实地说假话，昧良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见不鲜，尤其在反右运动里这是左派之所以成为左派的招术与窍门。要想从右派羽化成一个左派，也很简单，只要你交出灵魂跟着发疯去吧！

许多可敬可佩的同牢至今情愿忍辱负重，在精神奴役和肉体折磨中，即使交出了性命，仍然坚守正直，维护良知。但在这里识时务者只能少说为佳，维持这种不可或缺的世态炎凉。保持专政环境的恐惧状态，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何况你是打入另册的贱民，岂能乱说乱动？沉默无语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直到我消瘦下去，站着想坐着，坐着想躺下，又拉肚子。巡诊的医生怀疑有肠结核，钩虫病，浮肿病，建议住院治疗。队上立马同意，并安排送我走。

这里先后死去三人。第一位是用伙食团炊事员发火的边角废料钉个火匣子下葬的，第二位只找到几根木条钉篾席勉强做成棺槨的样子。第三位实在找不出什么能做成像样子的容器，只好将就他生前的卧具包裹着软埋。据说人类是从埋葬伙伴开始才与动物界区别开来的，总之队上能像人那样埋葬监督改造的队员，保持最起码人的尊严，还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有第四位，又将如何处置呢？队长当然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赶快送我住院去，不免有他的担忧与好心。赶车的小管一直沉默无语，怕把我抖散了，不扬鞭，不吆喝，任凭老牛左摇右摆走之字形慢慢下坡。平时步行狮子滩至多1小时，送我的牛车摇拢已是电灯亮了。比起队上的煤油灯倍感辉煌，心情也敞亮起来。管他妈的，我还真想活下去呵！

但是，主管医生洪老头不收，说我这些病他无法治也无药可治。小管赶紧扶我上检查病床，自己调头一响鞭回去了。

## （二）

洪医生拒收是有道理的。

农场医务室本在从重庆方向来的公路抵达狮子滩右边的几间破旧工棚里。而这里是临时应对浮肿病搭建起来的，长约10米，篾席封三方，油毛毡盖顶，紧靠狮子寨后壁的偏搭棚子。内设两边通连的铺桩，上置一人一张的活动竹凉板。这便是住院部，没有牌子。

从农场所属各区、队送来的病人，不是肿得跟大湖里捞起的“水打棒”（浮尸）差不多，便是枯瘦如柴，与尚有一张人皮包裹着的骷髅无异，只有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间或还在动。我大概属于后者类型。洪老头只见条子上疑似肠结核、钩虫病，忽略从浮肿直到消瘦的病程，第二天还是把我当成浮肿病住下。

我嫌进门口敞风，费力拖着背篋正往那里头空位置移动，一旁躺在床上的仁兄突然撑起身叫我。原来是在南桐一起修过公路的市新华书店右派同门老刘，他制止我向那头搬过去。尽管那头不敞风，又空有位置。原来，那里有扇后门平日拴着，说是死了人才会打开后门抬出去。因此一般是奄奄一息又无法起死回生的，才常常连人带凉板被抬到那头去等候生命的结束。但有的在抬过程中，突然活了，还宁死不屈，用最后的挣扎滚到地上落气也不甘心走向黄泉之门。难道你想等着开那扇门！？

我赶紧回到原处，这一头正对着大湖出水口拦截龙溪河的大坝方向，应当是太阳升起的东方。

老刘患类风湿，手脚关节变形，外加浮肿，同样遭到过拒收，后来还是以肿病留下。跟他的名字“时雨”一样，谢谢他能及时地拉我一把。

眼看两排躺着的病人，从大门这头横排到那头的后门，总让人感到这里是在依次等着死

亡的无法回避的凄凉。

不过，在这生与死并存的地方，为什么朝着重庆的那个方向，偏偏意味着死亡？

重庆，我们从那里走来，每一个人的心底无不挂念着你，无不企盼着早日回到你那里去。努力改造，拼命劳动，奋斗中不幸的弟兄在这里倒下去了，惟独给他开一道朝着你的方向上路的后门，这是礼遇？还是惩罚？为何冥冥中的命运作出了如此荒谬无情的安排？

住院的一日三餐，要到距此 800 米以外的场部食堂去打饭回来吃。病重走不动的有同室病友代打回来，但绝大多数愿意亲自前往。一群拄棍拖棒衣衫褴褛，肿的肿，瘦的瘦的乞丐，稀稀落落前前后后缓慢蹒跚前行，展示着三年来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战场上，不是溃败，而是英勇负伤，不得不暂时撤下火线来的悲壮的英雄气概。

早在窗口前排队的人们投来复杂的目光，有悲悯，有厌恶，有惊悚，有发愣，有漠然视之，有兔死狐悲，有的推推眼镜，有的仰天无语。更多的是不经意地让开路来，悄悄转移到另外的窗口去了。

饭后，坐在各自的凉板上，我们等候检查、发药。

这里的治疗药品，不外乎维生素、酵母片、葡萄糖，主要的是黄豆、黑豆、花生、麦麸、米糠，加红糖、蜂蜜、中药材，捣腾炼制而成铅球那么大的东西，取名为“康复丸”。

开初一人一个发给，有的一次吃光，发生不少的意外，出现泄泻、腹胀、梗阻等等。后来由医生护士切成小块，早、中、晚每人各发一块。

服药后，都很听话，卧床休息。当医生护士回到医务室去应对日常看病的病人时，住院病号纷纷起来，阴一个阳一个悄然无声溜出去。

经过几天吃了便睡的治疗，还真有点效，我也有了余力跟着老刘去狮子滩闲荡。

农场场部是座壮观的大楼，是当年筑大坝修电站留下的苏式建筑。前面以片石压鹅卵石层层水泥浇注的广场，停放重型机具的地方，也是现今批斗、公审、宣判反革命，斗争抗拒改造、思想落后的随时冒出来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的会场。

由重庆经长寿县来的公路正从大楼广场前面横亘而过。派出所、供销社等等依序列于大马路的另一边，形成半边街市。临到场口大门处，向左手拐进去则是狮子滩饭店前的场子，别有天地别是一番滋味。饭店兼营住宿，是这里唯一的招待所。

饭店前排起一条长长的人龙，说正在卖小球藻汤，那是我国科学家最新的发明，其营养价值非常高，说是一碗汤相当三碗干饭的营养价值，一分钱一碗。难怪街上人迹稀少，大多数都来排队了。

在饥荒的日子里，人们被饥饿培训出喜欢排队的德性，也不管前面卖的什么，几乎是见队就先排上，然后才问个究竟。我从农村转移农场时经过重庆，在解放碑附近我也目睹过一次里三层外三层的排队，最后人人哭笑不得不欢而散，原来只是有一个小孩子内急在街边拉屎。

老刘坚持要排队，说是不可放弃难得的机遇，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啊。我怕排拢一场空，不如就地转转。

杨槐树下一堆堆人头窜动，这是背篋市场。那时没有自由市场，不允许私人交易，眼前农民背来东西出售都是非法的，偶尔还见到供销社、派出所的公家人出来撵走或收缴农民的出售物品，卖的买的都处在提高警惕的惊恐状态之中。

凡能吃的野生的折耳根、野油菜、桐蔴菜、水茼蒿都拿来出售。有黑黢黢的桐子叶包的麦粑，干煎包谷粑有饼干那样大，5 分钱一个。还有不让看的，破布烂草帽盖住的更多令人惨不忍睹的东西，死猫、死狗、死耗子都有，病死的、家养的、偷来的、各有来路，都无法弄明白，而更多的是参子鱼干。这些东西大多数不卖钱，只换衣物，手表、胶靴、打火机、岩盐、烟叶、火柴、手工草纸等等。但是钢笔是不行的，哪怕是金星、英雄名牌，甚至派克也没人要。也许人们早已意识到读书写字危险，也见不到书籍文化用品出售。

但有一个戴凉草帽肩挂搭连的家伙鬼鬼祟祟东窜西站，售出、买进和兑换粮票、布票，同时收购银元、金银首饰、金属制品。据说拿去少数民族地区卖高价。

这里多是实物交换，一切面议。若用钱买，那就价格不菲了，因此以物易物或货币交换或二者混杂一起的讨价还价都十分热闹。好像时空发生了错乱，一下子倒退到了何年何月，不知马克思说过这叫什么社会经济形态。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戴顶深藏不露的破草帽在挑选鱼干，脸上戴个大口罩和眼镜，但我还是认出他就是作动员口才很好的那个干部。他慌慌张张很快离去。当时他描叙的美景宛然在耳，他却在这个自己赞不绝口的地方，偷偷摸摸来买小鱼干，看来他那些动员也是“扯靶子”（胡编乱造），出于无奈啊。

突然，我又看见一个女孩站在饭店左侧煤渣炭灰堆旁边，也戴顶深遮面目的草帽，穿着深蓝色短半衫。大半年前我从狮子滩挑粪回队，半路上正在红湾（原名黑湾）马路边歇气，她挑着行李赶上来问路。我以为她是被补火下来的右派分子，其实是城市里精减职工返乡落户的年轻人。当年她出去务工时走的那条石板路早已淹没在大湖中去了，我告诉她沿着眼前这条公路往前走就会到达双龙场。她满脸的泪水与汗水混流一起，喘着嘘气连连表示感谢，给我留下了印象。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好像在等人。

这时，同病室的大汉，搞不清他的名字暂且叫老K吧，穿条火窑裤，挺起胸前的两排突显的肋骨。穿来穿去，寻找价廉物美可以交换的东西。手上捏着个小小布袋，颇有份量而且时有碰击声发出。他是个老兵，听说当初进军西藏的人员发津贴都是用的银元。可能他真的是硬通货啊。

原长航搞美术的廖希台也来了，照常一手提个装满折耳根的小筐，一手捏把野葱，是他在附近田边地角辛苦寻楝一上午的收获。他啥也不买，只是到处看看。据说他卖的卖，换的换，至今已是一无所有。但是，他告诉过我，即使无钱无粮，也无衣物可换了，每天到饭店前看看蒸包子馒头，闻闻打开笼盖时那股热气腾腾扑鼻的香味，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看来看去，我也怦然心动。想到背篋底有条藏蓝毕叽裤，在此生死难料的时刻，何不为自己增添一点生的可能呢。可这是我因爱惜而很少穿的裤子，幻想着调回去那天，我要穿得像个干部的样子回去。我又想到穿着的派呢斯裤子，如果脱了，跟一些人那样只穿内裤也行，反正天气还不太冷。可是这条裤子缝补过两次，到队上的医生给我皮下注射，我正要解皮带脱裤子，医生说不必啦，她撩开裤子的破缝擦碘酒一针就扎下去了。这样的东西还能换什么呢？

老刘居然排队排拢了，叫我站在他前面插轮子，买到一碗小球藻汤。一个土巴碗盛有泥腥味很浓混浊的温汤开水，外边有人发，里边的大锅还在熬制。不断有人挑水来添，还有一个像掌门的人穿着白大褂舀起一瓢绿苕苕的水往锅里加，煞有介事地不断搅来搅去，不知卖了多少挑水？

回来的路上跟老刘讲我的见闻，他不以为然，很多市井现象他早已了若指掌，还随意补充不少。说到那个精减回乡的女娃儿在饭店旁等候什么，他说，她几乎天天都在。老刘的腿脚不便，像两根木棒拄着地面在戳，速度很慢。老廖不声不响赶上来听见了，插上话来：她要跟别人开栈房。我想白日青光的开啥子栈房嘛？回答说，不是开饭店房间是让你到一个背静的坡坡去……不给钱，让她吃碗小面也行。看样子还读过书有点文化，唉！这年月文化有啥用啊？我一本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在市场上没人要，连同一摞精装书籍交给供销社当废纸收了，一角五分钱。真她妈的，老子有钱也得先来一角钱吃碗小面，哪个会跟她去玩命嘛。我想，有哪个舍得去干呢，她不是饿起肚子在白等吗？

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队里来的，也才敢口无遮拦说了一通。老刘说，你晓得啥子啊，前面电站做夜班的工人老大哥有的是吃不完的口粮，有的是全国粮票，不来作点贡献？饱暖思淫欲嘛，我都看见过几回了。当然你我不行，我那个老二这一年多来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走累了，他找个路边石头坐下继续讲：想不到跟着共产党来革命，为新中国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竟然奋斗出了个民不聊生，逼良为娼。

老廖又来劲了：唉！好端端的江山被遭塌了。彭老总有啥子错嘛？我看是发高烧，烧得来不省人事。

我是想劝住，你们又在忧国忧民？哪个不是一心一意帮党整风，到头来整出一顶右派帽子各自戴起。到如今生死难料了，还不安逸吗？自作自受，活该！

本想劝着少说些吧，忍不住也跟着发牢骚吐怨气，我也很吃惊。这是当右派以来，敞开心扉的一次大胆放肆的谈话，也许是人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哀，其言也真，其言无惧。我们一齐开心地大笑起来。马上又收敛起笑意，沉默中走回住院部，该吃饭，吃药，睡觉了。当晚服药后，比往日热闹。好些人都留着自己的晚饭没有动，要用心加工，要丰富内涵，要吃得更隆重，十分严肃认真地重新安排着一次晚餐。

当今食品丰富，人们精心烹调食物吃出个名堂讲究来。可不会想到在食物严重匮乏的长时间里饥肠辘辘中也会有人把面前一丁点食物，想方设法要吃出个百花齐放来。

老 K 从床下取出四处找来的拆工棚的竹篾块和干树枝，到外面三个石头架个灶，洗脸盆当锅用，烧起“锅锅宴”。把搞来的霉头烂渣的粗块包谷粉子添进二两干饭里熬成稀饭，加上野油菜叶子。显然颜色好看堆头又多，热气腾腾。他才端到床头摆开架势，满意地享受起来。

老廖只能把干饭多加水煮成看起来更多一些的稀饭，给以视觉的满足。把白天里四处找寻的折耳根加盐拌上一盆，另烧碗开水加酱油撒上切碎的野葱，这是他的开胃汤。他十分讲究，把他保存得很好的镀银西餐餐具拿出来，银叉子吃折耳根，银汤勺舀汤喝，银刀子切野葱，不时朝汤里菜里添加一些。怡然自得。

老刘打开农村老婆邮寄来的东西，豆豆果果，红苕片、萝卜干、家居咸菜。拨拨弄弄闹腾一阵子，才开始晚餐。如此享用晚餐的，还有不少的花样百出。那是当年的独特景观，这是民以食为天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时代“悲歌”。

我无任何补充添加的东西，也没有兴趣做这些摆杂。那时不会有人请你吃点尝点什么，而且看着人吃东西，不仅有失自尊，也实在难受，最好倒头睡去，睡眠疗法是明智的唯一抉择。

头脑里浮现出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的影像，胡思乱想起来，有些不祥的感觉。在医院里的这个晚餐总有一道阴影，下意识地感到这隆重的晚餐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明天清晨将会有谁被抬出后门去，是你是他或是我呢？当然这里没有耶稣，也没有犹大。只有一群背着十字架直面死亡的中华儿女。

### （三）

昨晚半夜开始肚痛，接连跑过三四次厕所。早饭不敢吃，只好等医生来给我们发康复丸时弄点啥止泻药。但是左等右等不见人来，老刘行动不便，还主动要扶我去那边的医务室。到达后见到医生护士正忙着处理一件极其荒唐的突发事件。

在见狗就要打来吃的年月里，能养活一条狗是奇迹。果蔬队副队长的夫人是农村妇女，她养着并完好保护着一条土狗。那时火柴、食盐、草纸都很稀缺，她的小宝宝拉屎不用草纸，都是唤狗来舔干净屁股。也许是饥饿难忍，舔着舔着一口咬去了孩子的小鸡鸡。两口子呼天抢地抱着孩子来抢救。

当然，我们等着。后来是小陈医生出来了。

平时她的态度好，本来是护士，我们很尊敬她，都叫小陈医生。怕洪老头不高兴，加了个“小”字。她问吃过些什么东西，给了些止泻药，看着我当场服下几粒。她便开始严厉批评训斥开来，浮肿病人乱吃、多吃，就是找死，死得更快，所以吃死的人特别多。愈想吃愈乱吃愈吃愈乱愈更无法医。狗儿饿慌了，那是畜生没有头脑乱吃乱咬，差点咬出了人命。当然，她只差说出你们都是人啊。我俩羞愧无奈又气愤，敢怒不敢言。有谁在把我们当作人呢？

老刘与我患难相扶，他扶着我，我牵着他慢慢摇回去。跨进门，顿感一股凝固的沉寂袭来。并不见有人快死了被抬到后门去，只见个个神情严肃各自坐在凉板上不言不语。

老廖说，刚刚结束一场批判会。斗争谁呢？斗争我们每一个人。



说是个什么书记，专门到此揭发批判斗争我们的恶劣行为。好些病号都不认识他，不知是何方大员？

他衣冠整齐，穿着长统胶靴，人高马大，有点法西斯的威风。首先愤怒地斥责我们这一群人一齐去打饭的队伍，是在有意示威，丑化社会主义，你们要抗议谁？抗议党的宽大处理，叫你们改造自新？还是抗议农场千方百计救你们的命？不识好歹的东西。尽在臊皮，臊到农场的面子上来了！还指责我们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拖一节掉一块，故意阴阳怪气慢慢走。有的又还有精神成天打着赤膊到非法市场游来荡去。没有一点想改造好的人样！

原来是他，曾经督战插秧要一个样的苏辛。果蔬队、采石场队和几个无法归属的班组人员的党支部书记，住在后壁岩上的狮子寨。时常明查暗访各处的生产情况，尤其注意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常常随心所欲地指定安排一两个右派下班之后，晚上去他住处谈话，做到既不耽误生产又要作好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样子。也不管你是哪个队、要走多远，好些人都受过他个别谈话的折磨，我也被叫去过一次。

他一边随便翻弄着精装本《联共（布）党史》，一边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说些摸不着头脑又沾一点边的话，对我说，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出身，受过那样的教育，你当右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需要。以及马克思说人本身有惰性，只有坚持劳动才不会堕落退化等等，强调体力劳动是人类进步的必需途径与阶梯。无易于威胁着说我不好好劳动会变回去成为猴子。听完训话，来回走了三十余里回到队上已是凌晨两三点了，第二天要抢收水稻，即使你马上变成猴子明晨六点也得照常上班。

我想只有这位市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有一副铁血心肠的共产党人，才会跑到这里来指手划脚要领导一切！

幸好我从医务室回来晚了，他若发现我在这个队伍里，不把我批成个带头示威的抗拒劳动的猴子吗？但是他狠狠洗刷挖苦了大汉老 K，说有一句老话“衣冠禽兽”，倒过来不穿衣服的是禽兽。你不穿衣是个什么样子？

这下惹毛了老 K，回敬一句：啥样子？老子光起身子渡江，照样嘞死一个个穿衣戴帽的家伙，有的吓得像龟孙子一样。你以为穿衣服戴帽子的就像人了？都是他妈的龟孙子。

没想到事态却戛然而止。老 K 并不知道苏辛曾是长江防线的起义军官，而且是地下党员给我军通报过江防上的设施要塞。无意凑巧点到了至今也说不清的穴道，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苏辛投湖自杀，我们才略知一二其中的缘由。当时他气得脸青面黑，恶狠狠各自走了。大汉找出一件中式无袖背心穿上又赶场去了。

中午前护士通知大家，要整顿精神面貌，穿干净点，不许成群结队去打饭，要分开走。

刚来的浮肿病号目睹这场批斗，无不感慨。说在岛子里用衣物裤子去农民家换麦粿、南瓜吃了，只穿着内裤上坡劳动的多得很，有的饿死了也只穿条唯一的内裤埋了。这有什么稀奇，他不进岛去看看，在这里提虚劲讲面子有啥用嘛！

其中一位 D 君，对大汉老 K 敢于顶撞不请而来的书记颇为高兴。大谈这个书记不晓得大汉是“纵横三千里，消灭八百万”的老战士，原在一个什么行政部门的小领导，是个吃得干得爱放大炮说真话的汉子。后来调到什么转运站去坐办公室，他不喜欢，当干部也跟着打赤膊去扛包子，搬运东西。吃饭喝酒毫不含糊，对“统购统销”政策怪话连篇。不言而喻，他必然走到跟我们一起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来。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何时老 K 已经回来，站在门口挡去三分之一的光线。“别听他胡勒勒，尽说些吃不得的话。我只想吃饱，天天吃这些吊药管个逮用，饿得老子心慌。当年我饿得心慌就去当兵参加革命，第一顿吃得好饱啊，差点撑死了。”到床前翻弄他的大背篋，没有找到什么，又把刚刚穿上身的背心脱下来丢进去。一头倒在凉板上叹气，想必也想睡眠疗法了。过一阵子翻个身又说：“他妈的这回真要革老子的命啦，多给点饭吃嘛，再撑一回死了也要得！”

中午大家先先后后去打饭，遵守新规定。发下的药分发给每个人的床头，有的吃了，有的先睡了。下午也没有几个人上街去，十分平静。



当晚，应当是一些人摆开阵式，再搞自得其乐的进餐如仪的时候，没有往日的兴旺。只有两三个人还在进行着，老刘睡了，老廖仍然摆起镀银的刀叉享用神圣的晚餐。

晚上，当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人看书，更不会交谈各自生产队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常常是几个人不约而同开始精神会餐，尽摆谈些过去吃过什么东西，其味之美妙，说得听者垂涎三尺。以及什么东西怎么烹怎么调，才是至味佳肴，好像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特级厨师。

老 D 突然发觉大汉中午没有吃饭，睡到现在还没有起来。走到跟前看见中午晚上的康复丸与药片都在床头，推一推没有反应，再摸一摸已僵硬冰凉。他大声吼叫起来，老 K 走了。

有人去通知医务室，小陈医生赶来，她摇头说晚了。早打点葡萄糖，强心针或许可以挽留他。

正如老刘说的那样，按习惯处理。七脚八手把他连人带板抬到朝重庆方向那一头停着，找来一盏自制煤油灯，则当是按习俗点的菜油长明灯照着他上路。

一些人帮助清理他的背篋，除了那件背心就是包过东西的烂报纸，实在是空空如也。还有一个烧得面目全非的洗脸盆在床下，身上穿着的火窑裤荷包里的饭卡上都划上了叉叉，这个月里他没有饭吃了，而且是前天已划完，还不知他是怎样折腾过来的。这时老 D 想起一个严肃的问题，说大汉有许多军功纪念章，过去每年八一建军节召开复转军人大会，他都戴着金光闪闪的勋章去参加，这次转移到农场来，看见过他有一个小包，十分珍惜，即是派出去参加双抢大会战他也要随身带上。哪个没有了？

听到这些，我心里一怔。但不能说出来，我明白了他在背篋市场上转来转去提的那个小口袋里发出的碰击声是些什么了。当时，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说出来了，大汉死后也不得安宁，甚至遭到更加莫须有的政治审判。唯愿大汉无牵无挂，安息吧！

第二天早饭后，指定了七八个病员收殓大汉并掩埋的任务，总是有人推三推四找借口不干，剩下老刘老廖和我还有老 D，以及不认识的两位。都是天涯沦落人，当时没有问过，至今想得起他们的模样，就是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老刘行动困难但没有推辞，首先去帮大汉把仅有的中式背心穿上，床下一双木板鞋，无法穿，又找不出一双袜子或一双其它的鞋来，脚只好光着。用被单把他裹住，他人高马大，包住了脚又裹不住头，只好顾头不顾尾了。

四个人抬起捆住大汉尸体的凉板四角，老刘扛上一把锄头。打开后门，朝着重庆的方向，我们把大汉老 K 抬出去了。

经过果蔬队旁边下河滩去，是大坝溢洪口冲积的河滩，还有些余水流淌在其间。我们朝对面大坝前的山坡抬去，脚下尽是乱石乱坑，溪水杂草。几个自身难保的人歪歪倒倒抬出七八米远就得放下歇气，抬拢也快晌午了。

河滩对岸靠着大坝的是猪旺子沙石山坡，长着根连根的地瓜藤纠结茅草根的地皮，十分难挖。眼看精疲力竭，早上的二两稀饭早已没有感觉，人人心中发慌。有位仁兄找到坎上一块平地有一处凹下去一些，他提议不挖坑，放在这里，再搬石块泥土堆出一个坟莹来，大家一致通过。

没想到搬泥土找石块并非易事，没有箩筐全凭双手搬运。堆了很久也盖不住大汉的躯体，要想垒高点就必须扩充周边，需要更多的石头和泥土，几经努力勉强勉强掩盖住了。我们拖着快累散架的身子，我帮老刘扛锄头，另两人抬着凉板回去，稀稀拉拉散在河滩中往回走。

在沉默无语，疲惫不堪的缓缓行进中，有一位仁兄，居然拖声哑气吼出山歌开头“唉”的高音，甩上了天，旋即落地，凄切又宛转。“情哥哥——你死得一惨啊——打双咯——光脚——板！”在河滩上空颤抖、回荡、悠远。

我下意识地回头望去，只见大汉的大半只脚又露出来了，直耸耸的脚尖挺立在坟头上，正对着重庆。

我加快脚步赶上几个连手，是不是回去再垒点泥土，要让大汉入土为安，但没有人答话。

快拢住地时老刘开了腔：又累又饿，还是等明天带上工具去添土吧。吃过很晚的午饭，我们昏睡了一个下午，疲倦得万事皆休。对大汉那只外露的光脚，心里总欠着的心情时隐时现。

至今我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其妙，我们掩埋大汉的五个生死未卜的人，当天晚上，不约而同，无言无语，各自翻找出一双破的臭的不成对的有的还是新的袜子穿上了，才先先后后放心地睡去。

第二天早饭后，发药吃药正想着添土的事。洪老头来宣布出院的名单，除了老D，埋人的其余四人都在内，当然是说我们都已恢复了“健康”，应该回队去抓生产，夺取粮食丰收。当然，在前言后语中夹杂着把你们医好了一点，不知趣跑到街上，到场部跟前去臊皮的批评。给每人发了两个完整的康复丸。我们愤然背上背篋走了，在红湾路上，跟老刘老廖，还有那个唱山歌的仁兄（说是从川江航运来的，遗憾的是没有问过他尊姓大名），互相挥手道别，他们去红湾码头等生产队出来的船进湖心岛子里去。

我遥望着远远一坡大石滩上的青瓦屋顶。没死应当高兴，但面对坑坑洼洼的归途，又不免踟蹰不前。在这没有丝毫个人自由的国度里，别无选择还是磨磨蹭蹭各自默念着“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回去了。

50年后的今日回忆往事，老刘老廖已先后作古，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偶尔在噩梦中又浮现起大汉耸立的脚尖，没有再添上一把土，不时内疚，不可释怀。

近来，难友的儿子找我了解当年五七受难同仁的情况，还有意要建立一座纪念碑警示后人。我很想建议碑体设计，就用掩埋未了的脚尖屹立着的造型，不知可否？

2010. 8. 25

---

## 幸亏江青没找到我

万声口述 谭松整理

我是山东济南人，1933年到上海，参加了左翼剧团，左翼剧团当时是上海非常有势力、有影响的团体。我同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上海期间，我认识了蓝苹（即后来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一起演过剧。蓝苹也是山东人，她到上海时，是个不错的青年，思想进步，大方开朗。1935年冬，我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山东，到省立剧院工作。1936年，蓝苹到济南，这时，她已经不再爱她的第二个爱人唐纳，她想同章泯结婚。我们戏剧界的人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因为不合适。唐纳追到济南，江青不见他。唐纳一气之下自杀，但没有死。我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跑到医院去找他，并且亲自把他送回上海。江青文革中要是找到我，我肯定活不出来，因为当初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的人，一个个都被整死了。

抗战初期，我来到重庆，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一直呆到解放。

快解放时，我在重庆演剧12队，队里有两个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很了解，也很赏识我，解放后介绍我进了市话剧团。

1952年突然把我打成“三反”的对象，关起来审查。这是我人生遭遇第一次政治运动。审了整整一年，整得我昏头转向。后来剧团要到云贵川演出，慰问解放军，需要用人，突然放了我，没作任何说明，更没有结论，我莫名其妙（至今也莫名其妙）。这次运动对我是个转变，从此我不爱说话，从此我远离领导。

1955年肃反运动，突然说我是反革命，又关起来审查，还派人到外地去调查。折腾了大半年，后来剧团要到北京演出，急需用人，又放我出来，重新担任舞台美术队队长，赶赴北

京布景。这次，又没有任何说明，抓抓放放，像是舞台上演戏搞着玩。

鸣放时我一句话不说，反右也没我的事，我遭在反右之后那个“向党交心”运动。

领导说：“交心，是指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党讲。”我信以为真，把我三反、肃反心中的疙疙瘩瘩交了出去。哪晓得书记说：“你是带着黑心向党交心！”“你向党交一颗黑心！”

一巴掌打下来，我当了右派。

对我处分很重，别人是三降（降职、降薪、降级），我120元工资全部取消，只发10元生活费。组织上说，10元钱够了，人民公社伙食费是4元，还可以剩6元。其实，长寿湖伙食费是8元。我有一个家，有孩子，都不管了？好在我妻子一直没同我离婚，我每次回家探亲，都是她给路费。

她想得很细，我回来，一定让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儿子见到我，高兴得哇哇叫，他一对他的小朋友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来接我了。”

在长寿湖近20年，我十分老实，一天难得说一句话，更不私下写任何东西。文革时造反派突然来搜查，翻箱倒柜，找不到我一张纸条。那些年人与人没有感情可言，我觉得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我们戏剧界，30年代在上海一起干过的人，解放后都被整死了，我活下来不容易。

（采访时间：2001年9月19日，地点：重庆市话剧团）

采访后记：

万声先生是我采访的第52个长寿湖右派。前期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他，说他当年与江青共事，同台演出，说他若不是当右派躲在长寿湖，肯定被江青整死，还说他高高的个子，堂堂的仪表，饿急了时竟趴在地上拾人家吐的鸡骨头……

我相信他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万声先生站在市话剧团宿舍铁门外等我，84岁的老人，腰身挺拔，眉目传神，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透出当年舞台艺术的神韵。

我坐在他陈墙旧壁、毫无艺术气息的家里，期待着一段波澜起伏的人生。

“咚咚咚”，有人敲门，进来一位老人。万声介绍，来者是话剧团另一位右派肖培禧，也下放长寿湖。

来者滔滔讲起他的经历和感受，一口气讲到十一点一刻。

送走肖先生，我急切地转向万声。

万声讲了二十多分钟，便不再多说。我声声追问，感觉已是拖不动的车。

我只好起身走人。万先生满目慈祥送到铁门外。

步入山城秋阳明亮的炎热中，我突然明白，万先生压根不愿意我去采访，但以他的厚道，他不便拒绝长寿湖难友的儿子，于是，他找来肖右派，占据说话的时间。

他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了，“三反”之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他不是已经说了，向党交心的后果？

一个已经被完全改变了的人，为什么要他在他人生的迟暮向一个后来者“交心”呢？

“万声”，已经变为“无声”。

我感到难过……

# 长寿湖又一个延安老革命——朱恩源

朱恩源口述 谭松整理

朱恩源是西安人，1937年底，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到西安招生，19岁的朱恩源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对延安怀有神圣的向往，当即与堂哥一道报名前往延安，成了抗大政治大队的一名学员。1938年初，朱恩源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江青等人一起坐在小木板凳上聆听毛泽东讲“论持久战”……

毛主席平易近人，讲的那些道理也打动人心。我先在政治大队学习，后转到军事大队，毕业后被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回延安，担任了延安警卫连指导员。

那时我才23岁，干一番事业没问题。一个意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我堂哥与上司闹矛盾，害怕被整，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延安。他一走就牵连到我，组织上三天两头逼我交代堂哥的去向。堂哥走时并没有告诉我，我实在交代不出来。我害怕了，听堂哥说过，党内斗争很激烈，整死的人很多，有一种药一捂就死。他还了解到有不少连营的指挥员被暗杀，堂哥不辞而别，就是害怕上司要他的命。

我看上面逼我那个架式，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最后我向组织提出，愿意外出寻找堂哥，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在1941年初离开了延安。这一走，便是同宝塔山永诀，从此我流离颠沛，再没回到党的怀抱。

不过我堂哥后来又重新入党，并为解放天津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解放后，我对组织详详细细交待过在延安的那段经历，但是每次运动都要清理我，怀疑我，不过总算还平安，我在西南煤矿机建局土建处当了个技术员，结了婚，有五个子女。

1957年组织上叫我们“真诚向党提意见，说出来党才好改正。”

我信以为真。

我认为土建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处领导不懂业务，导致了很多质量问题，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我老老实实在地说：处领导过去参加革命有贡献，但现在在建设时期，不学技术搞不好工作，这几年质量事故很多，主要原因是处领导不学业务，工作好几年了还不懂业务。

我们处领导是战争年代军人出身，虽然不懂技术，但善长打退敌人的进攻。反右一开始，我就被抓出来斗，说我不接受老干部的领导，看不上老干部，自以为懂技术，老子天下第一。

最气人的是把我打成右派后，还派人到我家里强迫老婆同我离婚，老婆不干，组织上干脆把她和我一起下放劳动。五个小孩在家里没大人，苦得很。后来看实在没办法，他们才放了我老婆。

在长寿湖我最悲苦的记忆是在那个“疗养所”。

饥荒年，饿死不少右派，一些人饿得东倒西歪，我自己眼看也要倒，在这种情况下，农场在同心岛上办了一个“疗养所”，收那些来不起的人。

1961年我作为重病号进了“疗养所”，照顾我干最轻的活——在厨房洗菜。

那个“疗养所”是我的地狱，我想死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已经病得几乎走不动，每天在厨房洗冷水，冻得我浑身发抖。管教人员天天冲着我臭骂，说干这么轻的活还叫苦，是成心抗拒改造。家里也来信责怪，说我给全家带来灾难，要我好好改造，争取早点摘帽，免得影响家庭。

我的确想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但实在力不从心，我下长寿湖时已经过了40岁，生活把一切路都堵死了，只剩一条死路。一天傍晚，我上厕所，头一昏，栽倒在粪坑里。当时要是栽在湖里，我就不挣扎了，可惜是栽在粪坑里，要死，也不能死得太臭。所以，我拼命爬了出来。

疗养所总算看出我快不行了，一副骷髅像，不是装出来的。他们不愿意我死在疗养所，

打发我回家疗养。

我在朝天门下船后爬那一坡石梯，唉，我都不想提那段往事，不到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每走几步就坐在地上喘气，甚至象条狗趴在地上，上上下下的过路人看我那种眼神，一辈子忘不了，我不像人，像鬼、像骷髅。

趴在冰冷的石梯上我觉得我走不回家了，这条命要丢在这儿。

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两个月，才勉强恢复元气。两个月后，我又回到长寿湖继续劳动。

我一直没能摘帽，1979年“改正”时才一笔勾销。“改正”的材料、结论都没给我看。单位领导说了一句话，算是了结：“你‘改正’了，摘帽了，今后要好好工作。”

朱先生今年已经83岁，我问他回首这一生有什么感想，朱先生回答：

在抗大学习时，教育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这一点，我现在仍然很拥护，但是，共产党理论上一套，实际上另一套。比如，当年我在延安学习，学的是：共产党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现在看来刚刚相反，它一心为自己谋幸福，当官的一心为自己谋幸福，与我所学的完全是两回事。在抗大学习时说，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人人平等。我很受鼓舞。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觉得他对人很亲近，很平等。现在，共产党当权半个世纪了，既没有消灭剥削，也没有消灭压迫，更没有平等。别的不说，我孙女在医药公司就深受剥削和压迫。公司领导强迫她和其他人加班，不付一分钱加班费，最多的一个月无偿加班近100个小时。我孙女不敢吭声，因为领导说，不愿干的可以下岗走人，找工作的人多的是。公司领导自己花天酒地，公款出国旅游，游遍了欧洲游美洲，职工不敢吭一声。这就是剥削和压迫。我去延安前当过学徒，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但比较起来，现在厉害得多，更主要的是，那时压迫还有反抗，现在不敢有一丁点反抗，这口气我一直憋着，想找个新闻单位告他们，又怕孙女失去工作，现在工作不好找呀。

还有，我们门外有一个城管队，附近是个菜市场，我经常看见城管队的人飞扬跋扈，敲诈老百姓，动辄罚钱，动辄一脚将农民或菜贩的菜踢翻。前几天借口一个送牛奶的将自行车停在人行道上，硬敲人家20元，而他们自己经常将摩托车骑上人行道。比较一下，我觉得国民党的城管和警察没有现在的坏。总之，我认为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因为根子上烂透了。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3日，地点：重庆市南坪）

## “麻麻哈哈”二十年

陈华口述 谭松整理

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其它“分子”，我下长寿湖十几年纯属误会，也怪我，那时年轻，麻麻哈哈，一会儿“好人”，一会儿“坏人”，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一辈子搞美术、摄影。解放前在一所小学教书，解放后先后在五一电影院、西南文工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歌舞团工作。

1957年反右，歌舞团划了一批右派，下放到南桐矿区劳动，没有我。同时还去了一批下放干部，也没有我。1959年10月，领导通知我，到南桐参加短期劳动，我不敢违抗，背起铺盖卷就去了。

南桐的人认为我一定是有问题才被放下来，把我安排同右派一起劳动，这当然是最苦最累的活。干了一个多月，发现我不是右派，把我调出来，归到下放干部一类，也就是说，按“人民”对待。1960年，上边通知，下放干部回归原单位，右派分子转到长寿湖。由于我是独自一人去的南桐，下放干部的整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于是，通知回城的干部人员中就

把我漏下。这一漏，就漏到右派分子中，漏到了长寿湖。

我那时年轻，麻麻哈哈，不晓得跑回单位闹，心想，长寿湖就长寿湖，反正工资没少，锻炼一两年再回去，没啥不得了。

结果在长寿湖干了十几年！我有六个小孩，1960年我妻子病逝，六个孩子在家里没父母，大的拖小的，不是个日子。

在长寿湖，我身份很微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2年农场把所有的“分子”分为两类：一类右派，一类地、富、反、坏等分子。后一类集中在团山堡。我被划为后一类进了团山堡。那一次整得凶，所有“分子”不准外出，一个个交待问题。但是我例外，我可以划船到狮子滩买东西，而且，也没有让我交待。这样看，我又算好人。你别小看了“名份”，那个年代“名份”定你生死。“坏人”中也要分等级，摘帽右派比没摘帽右派日子好过，没摘帽右派又比“顽固右派”轻松。例如，仅说干活，最重最累的活，如冬天下水，雨天出工等，往往是没摘帽的去干。挨斗挨打，遭得最惨的是“顽固右派”。

总的说来，我在长寿湖没吃多少亏，主要就是我没戴右派帽子。1963年我同长寿湖女右派颜淑群结了婚。不久，右派要集中到项家坝，而我在团山堡。我坚决要求妻子同我在一起，上面也破例同意了。我想，这都是归功于我的“名份”。

由于我会摄影，场部拿出250元钱，让我在狮子滩开了个照相馆。我跑遍了长寿湖的山山水水，亲眼目睹了右派非人的生活 and 奴隶一样的劳动，我还给一个淹死了的女右派的尸体拍过照，可惜记不起她的名字了。

我庆幸我没当右派。

1976年我同一些右派一起回到歌舞团。没摘帽的干扫厕所之类的活，摘帽的可以安排到厨房，他们开会单独开，而且不能吃样板伙食，样板伙食就是有肉吃。我回来后没扫厕所，没下厨房，而且吃的是样板伙食，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属于“人民”。

不久，女儿要入党，组织上来调查我，歌舞团人事处的人说：陈华正在落实政策中。对方一听，肯定有问题，女儿入党的事便搁下来。还有一次，单位供应白糖，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购买白糖，请把钱交到陈华同志处。人事处的人见后，叫人去把“同志”两个字擦掉。给人印象我有问题，是“坏人”。我一气之下找到院长说：“我回来一直吃样板伙食，到底有啥子问题？”院长很不错，为我专门去了文化局，文化局找不到当年处分我的任何材料，给我出了个证明：该同志没受过处分，没戴帽子，长寿湖宣布摘帽是错误的，应当消除影响。

我那二十年，不明不白地过，子女受影响，本人活得窝囊，麻麻哈哈。我不敢据理力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虽然肃反时作过交待，共产党也作了结论，但总是一个历史疤痕，骨子里觉得共产党整我一下好像也应该。自己底气不足，受点委屈，挨点整，算了。看看那些右派，看看那些分子，那才叫整得惨，我算没吃大亏，日子过得去。要说冤枉，我第二个妻子颜淑群才冤。她什么问题都没有，也没鸣放，只因为前夫是国民党川粮处处长，被共产党镇压，就把她抓出来当右派。我看到冤的多得很，我不算啥，真的，没啥。

（采访时间：2001年11月6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陈华老人讲述时用得最多的一个“口头禅”是“麻麻哈哈”。

他“麻麻哈哈”下长寿湖，“麻麻哈哈”被集中在审查“分子”的团山堡，“麻麻哈哈”被摘掉根本就没戴过的右派帽子，“麻麻哈哈”在“好人”与“坏人”中找不到名份和位置……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麻麻哈哈”过了一辈子。

其实，这哪里是陈华的“麻麻哈哈”。

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必然“麻麻哈哈”；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必定“麻麻哈哈”；

一个视个体生命如草芥、公民如奴隶的地方，必定“麻麻哈哈”。

一言不发的颜淑群被打入长寿湖，是不是“麻麻哈哈”？

千万个知识分子莫名其妙成为“敌人”，是不是“麻麻哈哈”？

“麻麻哈哈”是专制绞肉机的另一个血腥特性，而非陈华老先生的“稀里糊涂”。

（陈老先生还保留有部分当年他拍摄的长寿湖照片，他无偿地提供给了我，使我们看到一点当年的旧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谢没有明确把他划为“坏人”。）

## 我走向父亲死亡的地方

何隆华口述 谭松整理

何泰贵，长寿湖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他为一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并祸及妻儿老小几十年。

那句话是：“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下面是其子何隆华（1948年出生）的亲身经历。

我八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十七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十七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我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庭。父亲学校的领导反复动员父亲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父亲于是说了一句：“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父亲说这话是基于当时学校调进了不少没有文化的人，包括一些转业军人，这些人也站到讲台上上课，效果极差。为这句话，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弟弟才六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读四年级那年，九岁的我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的点名册中，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的“右派家属”四个字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我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我们班有三个出身成分好的同学程温斌、陈森林、宋同福。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出奇的糟糕，但身强力壮。他们经常暴打体弱的同学。我不仅体弱而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负的对象。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程温斌老是抄我的作业。一次我稍示不满，他踹了我几脚后，跑到讲台上活灵活现地表演想象中的解放前：他们家大雪天提篋到我家里讨饭，被剥削阶级的我父亲一脚踢出门外。全班男女同学哈哈大笑，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屈辱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表演完后，程温斌还丢下一句话：“不管你成绩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学！”

1964年8月，程的这句话不幸言中。我们班（重庆三十九中初六四级五班）52名同学几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专，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落榜了。

一向健谈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沉默了，收拾了几本他自己的书递给我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随后，龙门浩街道办事处于子力书记拿出一张纸单向我母亲宣布：“无产阶级教育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下面念一下上级通知——龙门浩地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

我自然在那八十人中。为了迅速把我们这些“分子”子女撵下乡，街道办事处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对父母双亡只有十五岁的贺树全，办事处通知供电所停了贺的兄长的临时工工作，兄妹三人断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中贺树全只好下了户口。又如贺亚伦全家老小九人，靠其父在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工作维持生计。街道办事处采取分批进屋24小时轮番“轰炸”战术，最后干脆通知学校停发其父的工资……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孤儿寡母早已是阶级斗争暴风骤雨中的惊弓之鸟，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母亲如果再出点问题，一家人怎么生活呀？

我清楚地知道，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爱我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和我珍爱的校园生活将永远离我而去。临行前集中住宿在两路口公寓里，睡梦中泪水浸透了枕头。学校上课的钟声条件反射地将我惊醒，我茫然地看着窗外，校园的钟声今生已与我无缘……

1964年9月，我下乡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那时我尚未满十六岁，体重七十五斤。我在那大山里做了八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

最痛苦的是在精神上。夜深人静时我冥思苦想：父亲因言获罪受辱，就算有罪，他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而我何罪之有？想到这儿，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受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希望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

为了回到离别了八年的重庆，1972年我只好了到别人都不愿去的运输合作社。所谓“运输”，就是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等苦力活。上班第一天我领的工具是两个竹筐、一根扁担、和一条再生布搭肩帕，工作就是到码头木船上挑煤炭。

运输合作社人员结构可谓“复杂”，除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外，老的下力人大多数都是从各个单位淘汰出来的“黑五类。”我所在的第五组中就有原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出来的宪兵班长黄杰、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肖中一、国民党赴缅青年远征军周绪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国民党“内二警”卞绍中等等。这些人要嘛很有才学，要嘛十分冤屈。比如肖中一，他懂好几国语言。又如周绪光，他是抗战打日本，但只因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些人当时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训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还有，运动一来首先就把他们拖出来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几十年整下来，他们早已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一个个畏畏缩缩，成天心惊胆颤。有一个叫李伯安的摄影师，解放前曾被叫到南山给蒋介石拍过照，为此事他也被淘汰出来下苦力。前几年我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事，来了兴趣，想去采访他。我把朋友带到李伯安家，这时他已80多岁了，社会上也没再搞阶级斗争，但他一听到问起给蒋介石照相的事，仍然骇得心惊肉跳，连连说：“没有，没有！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

（注：我同何隆华都是重庆南岸区上新街的人，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个运输合作社。文革中的一天，我放学路过，门里面传来怦怦砰砰的踢打声。我扭头望去，几个汉子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边打边骂。不一会，中年男人被一脚踢出门来，摔倒在地上，里面还在骂：“今天先放你回去，明天来继续接受专政！”中年男子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压着被打伤



的腰，轻声呻吟着，一跛一跛地走了。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山城血红的夕阳映照的那张惨白的脸。)

管理运输合作社的人是一个叫淦某的共产党员，此人一字不识，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殊爱好，就是常常单独找一些长得胖胖的女知青到办公室去关门做党的“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后，这个女知青就有可能获得脱离苦力活而进入办公室的机会。

运输合作社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拉板板车、抬连儿石、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我们的心智，也佝偻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共四个知青，其中三人皆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他们是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他们死时都不到五十岁。

从1972年到1986年，我又下了整整十五年的苦力，其中的艰辛又是一言难尽！

此外，还有说不完的屈辱。例如，一次，淦某叫我们去给南岸区公安分局伙食团运煤炭、砖头、木料、石灰等。我们肩挑背磨，汗流浹背干了好几天。干完后，大家谁也不敢拿托运单去找公安局的经办人签字，签不到字就等于白干，拿不到工钱。那些老的“残渣余孽”们早被“公安”们整得心惊肉跳，谈虎色变，一个个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上前。最后他们对我说：“小伙子，你没有什么问题，好说一些，还是你去吧！”

我于是拿着托运单，找到公安分局管总务的警察李某。他双眼一瞪，把托运单一扔，吼道：“甚么？甚么！给公安局做事还要签字，还要付运费？！走！走！！”

我想到我们这么大一帮人，靠苦力挣钱，不甘心放弃，缠着他向他讨要。他烦了，一个电话招来分局有名的打手，刑警“王摩托。”“王摩托”一进屋，“哗”地一声掏出手铐说：“你敢在这里闹，老子把你铐起来！”

我强忍怒火，万般无奈地走出了公安分局大门。

……

到1986年，我已经38岁，已经下了23年的苦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我在劳动之余通过电大和自学考试的学习，深藏内心的求知欲被激活了。

1986年夏，《重庆日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启事》——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招聘教师。

长寿湖！我心灵深埋藏的那段悲情被触动了。我于是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到长寿湖应聘任教。

坐在长寿县城到长寿湖的汽车里，我刻骨铭心地想到了父亲！

他当年到长寿湖劳改也是三十八九岁……

我多次听母亲讲，父亲非常敬业，他复旦大学毕业，教一普通中学仍然备课到深夜……

在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我只是一个招聘的临时教师，但我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同时，我似荒芜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吸取着知识的甘露。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辉使大写的“人”在我心中复苏。在长寿湖渔场子弟校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我通过了自学考试、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的全部课程，获得证书。我教过初中至高中段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也得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信任。1987年底，长寿县推行校长负责制，我这个招聘教师经全体老师、职工代表和学生家长无记名投票选举，当上了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1987年春，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当年右派分子种下的大片大片的广柑树林，闻着在春天的阳光下喷发出的沁人的花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我又想到我父亲。

据说，父亲到长寿湖后仍然很讲究卫生。当时，不把右派当人，用装粪便的篲箕给右派

装馒头，挑到地头之后往地上一倒，饿得头晕眼花的右派们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但父亲不，他还要把沾了粪便的皮撕下来扔掉。你想，那是什么年代？一个馒头撕掉皮后就更小，他怎么活得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大约是在1960年初。他下放劳改后第一次回家。但是，家里人对他很冷。妈妈受党的教育多年，也认为他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哥哥姐姐饱受“出身不好”的痛苦，又在学校受了大量“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的教育，不自主地把他当敌人看。父亲想亲近子女，但子女躲着他。那个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外婆对我母亲说：“你看到没有，何泰贵的双脚是浮肿的。”可惜，家里没有给父亲一点资助。后来，母亲银行里的另一个右派家属张光宇对我说：我才不象你妈那么傻，我把黄豆炒了磨成粉，包做一个个小袋子，藏在何世平的衣服里，叫他饿慌了时拿出来冲水吞下去。”何世平因此活了下来。

父亲只在家里呆了两天，我清楚记得，他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仰着头，长时间地望着天花板。两天后，他走了，双手空空，一两粮票、一点食物都没有。

父亲很快全身浮肿。1960年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他“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当时，他才40岁。

当年的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很感叹地说：“六零年走的人算幸运啊！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文革中，‘黑五类’们头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

如此看来，父亲的早歿的确算幸运。因为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

又一年夏天，我游泳游向长寿湖深处，我看着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朵，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几十年人生。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20日 地点：重庆市南坪）

采访后记：

2004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遇到了何隆华，并读到他为《魂系大巴山》一书写的文章，十分感叹。2005年底，《魂系大巴山》出版，又细读了他的文字，当即前往采访。

在南岸区南坪何隆华的家里，何隆华谈到了一些他文章里没写进去的内容，好几次，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但，一直没有流下来。

2001年，我在采访时，仅从其他右派口中得知有何泰贵这么一个右派，饿死了。记录下来，只有一句话：何泰贵，教师右派，1960年饿死于长寿湖。

那背后的故事、那家庭的悲凉、那子女的不幸，一无所知。

本书中，有多少只有寥寥一句话就“交待”了一个人和其家庭的凄惨命运！

从何隆华家里出来，我老想起何泰贵呆坐在椅子上，久久望着天花板的情景——一个男人，此时是何等的绝望！

他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了，为了那一句“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言论”——  
——“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 “我不想说那些事，提起头就昏”

戴儒愚口述 谭松整理

我同何泰贵是在江北治平中学读书时认识的，他很快就喜欢上我了。后来上高中、上大学，他不断给我写信，写得很勤。我喜欢他是因为他非常聪明，在江北治平男中他老考第一；在西南联大也考第一；在复旦大学还考第一。在他大学毕业的头一年，我们结婚了，当时他23岁，我22岁。我们的婚礼办得很隆重，可惜那些照片在“文革”时全部烧掉了。

何泰贵毕业时，由于成绩非常优秀，又被保送到中央财大深造。老何这个人，是个才子，干事又认真，本来是应当有一番作为的。没几年，遇到解放（1949年），何泰贵是旧政权培养的经济人才，新政权不用他，他失去了工作，在家闲呆着。但是，他还是同其他人一样，满腔热忱地欢迎这个新社会。他跑到街上、码头去组织大家唱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后来，有人说他“身份”不好，不要他去，他才又呆在家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找了一些关系，才给他找了一份当初中教师的工作。他本来是学经济的，从此改行当教师。虽然只是教个初中，但他非常认真，每天备课到深夜。

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当右派！

我了解何泰贵，他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知识分子……共产党老是整好人……算了，我不想说这些事，这么多年了，说到这些事我头就要昏。

他下放到南桐农村劳动后，不断给我写信，写得很勤。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冲我说：“何泰贵组织观念很强呀。”意思是警告我，要划清界限。我害怕了，写信告诉他说，象你这种情况，不要再写信了，在那儿好好改造。

他于是就不再写了。在南桐最初时，我还知道他吃些什么，干什么，连他睡在鸡圈上，每夜鸡闹得他睡不着都知道。断了通信后，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后来转到长寿湖，更是一无所知，连他劳改和死亡的地点——同心岛——都是他去世后我才知道。

1960年11月23日，我接到了《右派分子何泰贵死亡通知书》。

他走了，他活不出来。他是个老实人，一个书生。从小他就很优秀，可以说出类拔萃，一直活得很有尊严。57年的巨变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紧接着的饥饿又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他活不出来。

我请假去长寿湖，身上带了十三个红苕。那时困难得很，每月一个人只有20斤粮，还要捐2斤“光荣粮”给国家，只有十八斤，每天六两。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支助何泰贵。

船到长寿县时，是下午一点，我不知道长寿湖往哪儿走，还有多远，我很少出门，心里很害怕。幸运的是，在船上一个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也要到长寿湖，他说他是到云集，还在狮子滩的前面，可以一直陪我走拢。

下船之后，他说去找个人，不见了，我心里发慌，站在那儿不敢动。过了一会，他返回来了，我于是同这个男人一块上路。

在路上，我掏出三个红苕送给他，算是感激他陪同我吧。他当场就把红苕吃了，那个年代，人人都饿得慌。

我们走呀走呀，天慢慢黑下来，又下起雨。荒郊野外，我独自同个陌生男人，心里又慌又怕……

突然我看到灯光了，那真的是像救星一样！

后来得知，这个地方叫邻封，是电厂的一个工地。

我们前去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男人很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但是我不敢把银行人事科给我开的证明拿出来，因为那上面写着：“兹证明右派分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我哪里敢拿出来？唉呀，说来也巧，办理登记住宿的那个人突然看着我说：“你不是上新街储蓄所的吗？”我赶紧说，是呀，你怎么认得我？他说，他到上新街去参观过，就是我给他们作的介绍。

我心一下子放下来，这下好了，他没要我的证明，给我在临时工棚里安排了一个住处。

虽然有了个栖身之地，但我哪里睡得着，天下着大雨，工棚又漏雨，我呆呆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又走，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还很远，要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

我在那儿等了两天，还是没能进去。银行只给了我五天假，往返就要两天，我不敢再等下去，没办法去看丈夫的坟了，不得不返回。场里的干部拿出一个麻布口袋，说：这里面是何泰贵的遗物。我打开看，里面是他用过的被子、穿过的衣服……

我提着麻布口袋匆匆往回赶。在一个三叉路口，看见有萝卜卖，想到家里挨饿的孩子，就买了十斤，我拖着麻布口袋，搬不动，只好把口袋移一段路，又返回来搬萝卜，就这样一段一段地往返，把丈夫的遗物和萝卜搬上船。

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我犯愁，怎么搬回去？哪知女儿隆静和儿子隆光早就等在码头，他们叫着妈妈扑上来，我眼泪一下就涌出来……

女儿何隆静在《撕开尘封》中描述：

60年的一天，我周末从寄读的汪山中学回到上新街枣子湾，才知道妈妈去了长寿湖。记得晚上很晚了与隆光去朝天门江边等妈妈，初冬河边冷风飕飕已刺骨了，只有我们两个小孩，不知妈妈何时到，我感到了忧心和凄凉。隆光说，他来接妈妈已经是第三天了，看着隆光忧郁的孩子脸，心里好冷好痛，想到隆光比我懂事，我俩因年龄靠近小时经常在一起，他本来是出名的淘气，总爱歪着嘴笑。家庭的不幸夺走了他的童年和欢笑。

直到1990年，我才第一次登上长寿湖同心岛，丈夫当年劳改时的住处已荡然无存了，他们只指给我看他去世时的地方，至于埋葬他的地点，一直没人说得清楚，他的尸骨，想必也早已无影无踪了。

（采访时间：2006年3月4日 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 在苦难中坚守

张一华口述 谭松整理

张一华：长寿湖右派张元任之子。

我爸爸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当时他在北碚44中学教书。运动都要结束了，上面来人叫他一定要给党提意见，爸爸顺便说了几句，大约是教学方面的，结果马上就被揪出来斗。我当时读小学四年级，认得些字，记得那大字报上有“张元任为大右派董时光摇旗呐喊”、“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爸爸下放农村后，我们全家生活立马陷入困境。最痛苦的是学校要把我们赶走，不准我们再住学校的房子，我们全家六口人被挤到一个7、8平方米的灶房里。我没地方睡，天天晚上翻到教室里，把课桌拼拢当床，夏天那个蚊子才把我咬得惨。

婆婆看这不是个办法，到市中区求她的一个亲戚，亲戚勉强让了半间屋给我们。

1960年我小学毕业，一毕业就给我一张通知书——到缙云山农场劳动，也就是下放农村。我们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收到了通知。这一棍子把我打昏了，也打痛了，后来我经历的那些挫折和痛苦都没有那张通知给我的打击大。我清楚自己“出身不好”，我也明白今后肯定不会准我上大学，但我没有料到连初中都不准我读，才14岁就要赶我下农场！

我一气之下跑到朝天门码头给人擦皮鞋，这一擦就擦了四年。那一段日子很艰辛呐。当时，擦皮鞋是非法的，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警察要抓，要收缴工具。我天天象做贼，看见警察的影子，提起箱箱就飞跑，就看谁跑得快。

另外，我还经常过江到南岸的黄山上去挑黄泥巴卖。从黄山到市中区有好远你晓得，一斤泥巴（捏煤球用）才一分钱。我为了多挣点钱，拼命压担子，十五、六岁，我就可以挑100多斤。你看我爸爸个子高高大大，我这么矮小，就是那时压的。

1964年，搞“四清”运动，我被抓了，罪名是“投机倒把”。一大批像我一样生活无着落，没工作、没职业的人（都是“出身不好”的人）也被抓了。我们被集中到沙坪坝办“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头半年没得自由，半年后准许星期天回家一次。我在“学习班”里一直呆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出来。“林彪事件”之后，社会松动了一点，准许我去干临时工，这样我进了一个厂当了临时工，几年后转正，成了正式工人。

现在？现在那个厂（重庆印制二厂）已经垮了，我放回家，每月从社保领取生活费400元。

那几十年共产党整我们，我认命，谁叫我们“出身不好”？我爸爸当右派，主要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我爷爷张一之曾经担任丰都、长寿、威远等县的县长，1950年3月被共产党镇压（枪杀）。爷爷死时我才4岁，不懂事，后来我到丰都、威远，意外地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清官，正直、有文化、有同情心。例如，前些年我到威远去找我妈妈的坟（她在我一岁时就去世了），在乡下遇见了一位86岁的老人，他得知我是张一之的孙子时，立马对我十分恭敬。他告诉我，我爷爷是个大好人，当官清廉，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遇到荒年，马上开仓济贫。我爸爸也说，爷爷当了多年的官，一生清贫，没有置下任何产业。“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见我们一贫如洗，不相信，认定我们一定是把金银财宝埋藏起来了。他们挖地三尺，真真的挖地三尺！就在我们的屋里，结果一无所获。

我爸爸继承了爷爷的品质，正直、讲良心，只是他一生太不幸。

他是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高材生，校学生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何鲁非常赏识他，把他引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可惜，“解放”不久（1950年），他就被公安局抓走，说他是特务，关押了一年多。后来查无实证又放了。几年后他当右派，1960年老婆离婚，带走女儿（从此他没有再婚）。1963年，他被重庆市教育局开除，从长寿湖回来后生活没有着落，只得天天起早摸黑走街串户去给人理发。当时理一个发小孩一角钱，大人两角钱（我擦一双皮鞋两角钱）。我们父子俩出卖劳力，一分一角的挣钱活命，但是我们两个都被当作“挖社会主义墙角”、“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投机倒把分子”。我爸爸好多次被抓住，收缴理发工具，人被扣押。我最记得我婆婆，每天早晨眼巴巴地望着爸爸出门，每天晚上又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回来。天一黑，她就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地盯着爸爸回来的路。多年来，我都忘不了婆婆晚上站在门外的情景。

我婆婆没有文化，但她一辈子温良恭俭让，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没有哪一处的左邻右舍不说张婆婆是个好人。“文革”时她也被抓来斗。爷爷被镇压时她还不到40岁，从此守寡，一辈子担惊受怕。

我这一辈子虽然只读了个小学，但是我清楚该如何做人。我爷爷、爸爸有很好的家传——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在朝天门擦皮鞋时，经常有其他娃儿来怂恿我去摸包（当小偷），他们说，擦鞋又累又不挣钱，要我跟他们干，我坚决不同意。再苦再累，我也要正正规规做人。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8日 2003年10月21日 地点：重庆54中学）

## 俏皮话

中国人最悲哀的就是：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还没爬起来，发现历史在倒车。

“随便谈谈，我们的主题：昨天、今天、明天。”“如果今天随便谈论昨天，明天就会被抓。我的话完了。”

用“昨天 / 今天 / 明天”造句：一个到今天都不能直视昨天的国家是没有明天的。

这年头，美国货、法国货、日本货……统统不好用，最好用的是蠢货，指哪就向哪儿，叫咬谁就咬谁，像特训过的狼犬一样听话。

新疆人卖羊肉串，甘肃人卖拉面，宁夏人卖枸杞，西藏人卖虫草，云南人卖鲜花，山东人卖大葱，山西人卖煤炭，东北人卖大米，福建人卖茶叶，广西人卖米粉，安徽人收废品，河南人当苦力，四川人当裸母，湖南人开的士，湖北人开餐馆，浙江人包商城，北京人卖批文。

前乒乓国手邓亚萍将调入人民日报社，任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总裁。现在的领导干部还懂个球，以前的领导干部球都不懂。

邓亚萍的奋斗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只要会拍，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俏皮话摘自网络）

---

## 关于《巴山夜雨》

友情交流的电子通讯，不定期，不定篇幅。无稿酬，也不收“版面费”。欢迎来这里“聊天”，把你们的往事琐忆、旧闻杂记、亲友追思、人生感悟等等写给我们，也可提供那些字行间回荡着历史风云的故纸残篇，如曾被视为“毒草”的昨日言论，曾被藏进箱底的日记书信，以及影响了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一纸判决书、平反改正通知书等等。

赐稿请发至电子邮箱：[bsyy1957@qq.com](mailto:bsyy1957@qq.com)